

## 目 次

序 言 .....	1
一 革命理論对同盟工作繼續开展的意义 .....	5
二 1850年同盟的发展 .....	21
三 同盟中央委员会迁往科伦 .....	29
四 德意志联邦和1851年的警察阴谋 .....	44
五 1851年5月逮捕后的德国工人运动 .....	57
1. 法兰克福工人联合会和拿騷的运动 .....	61
2. “工人兄弟会” .....	66
3. 职工会 .....	71
六 当局对馬克思学說广泛传播的恐惧 .....	76
七 普魯士警察当局对共产主义者同盟的 “审讯方法” .....	83
八 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的意义 .....	99
参考书目 .....	112
譯名对照表 .....	117

## 序 言

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德国工人运动史上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1847年，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前夕，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积极参加之下建立起来的共产主义者同盟，是第一个依据科学社会主义来进行工作的工人阶级组织。它在历史上开了一个纪元，从此以后，“那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社会主义……变成了工人们手中的最强大的威力”（斯大林）。马克思和恩格斯所领导的共产主义者同盟，在1848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及其后的反革命时期提供了为一个统一的、民主的德国而奋斗的最优秀和最坚定的战士。在这个斗争的历史上，共产主义者同盟不仅曾短时地站在前列，而且同盟为一个统一的、民主的德国所作的奋斗，对于德国工人运动是具有指示方向的意义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受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委托而写的“共产党宣言”，照列宁的话是，“抵得上多卷巨著：它的精神至今鼓舞着和推动着文明世界全体有组织的和战斗着的无产阶级”。“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的第一项：“整个德国应宣告为统一而不可分割的共和国”，即到今天还依然列在日程上面。

当1848年7月间普鲁士当局注意到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盟员在德国所散发的“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这种传单时，内

政大臣奥斯华德委派正往伦敦去研究英国警政的柏林警察总监米奴托利“調查該社团的密使的姓名和目的地以及該社团的詳細組織和意向,并将所得結果迅速告知,以便我部能够策动某些必要的措施”。1848年7月18日,普魯士駐伦敦的大使接到外交部的訓令,命其对米奴托利調查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工作尽量予以协助<sup>①</sup>。

这样,还在1848年的斗争中,这唯一給革命战士们指示正确道路的工人阶级組織就遭受追究了。因为共产主义者同盟不能不說是第一个领导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的組織,从而做了一个工人政党所应分做的事情,所以资产阶级和封建反动势力在1848年就已经尽力联合一致来打击这个組織。

当时用来打击共产主义者同盟的那些手法,尾追盟員、誹謗和捏造、雇用特务,仍然是今天资产阶级反对工人阶级所采取的手法。

正如卡尔·馬克思从最初登场之日起就受到敌視,正如共产主义者同盟从第一天起就遭到誹謗,正如关于同盟和卡尔·馬克思的謊言被人有系統地散播出去,来損害和減弱他們对工人阶级的影响,今天那些不願工人阶级在德国获得胜利的人,也正在捏造德国工人运动的历史,其方法首先就是把証明德国工人运动初期的伟大革命成績的一章一笔勾銷。德国工人运动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一切,都是以共产主义者同盟为出发点,以这第一个革命的德国工人政党的經驗为依据。

<sup>①</sup> 德国中央档案馆第二館, 麦塞堡, 第77日, 第609項, 第43号, 关于在英国的政治亡命者的革命活动以及在伦敦成立的散布共产主义革命傾向的德国社团, 第1卷。

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許多杰出的学生都是由共产主义者同盟出来的，就中如弗·勒斯納、威·李卜克內西，都积极地参加了社会主义政党和第一国际的組成和发展。共产主义者同盟所代表的学說，今天已使人类的一大部分获得了自由和幸福。德国工人运动的历史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因为它是以馬克思和恩格斯开始的，因为它是以科学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在共产主义者同盟中的結合开始的，因为它是以“共产党宣言”开始的。它是一部英勇斗争的历史。

因为有了共产主义者同盟，就开始了无产阶级对压迫者的富有成果的斗争的时期，到1917年11月7日终于在世界六分之一的地面上获得了决定的胜利，所以那些不肯把十月革命的胜利看作“人类历史的根本轉折点”（斯大林）的人們，就自然要尽力抹煞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意义。

在馬克思年（Karl-Marx-Jahr），即1953年，5月1日，西德右翼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新前进”說，德国工人运动是1863年才由拉薩尔开始的。在該报“庆祝党成立九十周年紀念特刊”中，不仅称1863年5月23日为“德語区域社会民主党的生日”，不仅把拉薩尔讚美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鼓动者、組織者和无与伦比的煽动家”，而且甚至认为馬克思“仅仅間接地对德国工人阶级”有所影响，“在空間上离德国工人阶级太远，不能深得德国工人阶级的人心”。把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从德国工人运动史中一笔勾銷，而以拉薩尔的全德工人协会为德国工人运动的开始，这等于从德国工人阶级手里把它那革命传统上特别重要的一章删去。这种删削的目的，无非是要把工人引上錯誤的道路，即

机会主义的以及和资产阶级联盟的道路。这必将使德国工人阶级不能领会德国工人政党的历史是从工人运动中承认马克思学说开始的。

下面的叙述会表明，在1849到1852年的反革命年头，共产主义者同盟是怎样站稳立场，并且不顾一切诽谤和追捕而作为德国工人运动的领导力量完成任务。作这种叙述时，第一次利用了普鲁士内政部和柏林警察总局1849—1852年的档案材料，这些材料直到1945年一向秘藏在“普鲁士国家秘密档案室”。还有许多很有价值的详情细节是从藏在莫斯科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的没有发表过的魏德迈耶致马克思的书信中录出的。对于莫斯科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的引导，使我有机会见到马克思和魏德迈耶的往来书信，在此谨表衷心的感谢。

卡尔·欧伯曼博士

1954年，柏林

## 一 革命理論对同盟工作 繼續开展的意义

随着1849年5月起义的失敗,1848—1849年的革命便告結束。这个事实对德国工人运动的意义如何,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他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一文中曾以如下几句话加以总括:“必須把分散的革命力量以及同盟的力量实行改組。又如1848年以前一样,一般形势使得无产阶级任何公开組織都不可能存在了;因此又不得不秘密地組織起来了。”<sup>①</sup>1905年弗·伊·列宁曾拿1905年革命爆发时的俄国情况和1848—1849年革命后的德国情况作一比較,郑重指出这个任务如何困难。列宁写道:“在革命时期的两个年头里,馬克思公开出版了工人政党的最革命的报纸达9个月,在这以后他不得不认定:工人政党完全解体,在总的潮流中完全沒有多少明显的无产阶级水流(斯蒂凡·波尔恩的工人友誼会是微不足道的),无产阶级不仅完全落到受资产阶级支配的地位;而且落到受资产阶级领导的地位;显然,当时经济关系还很不发展,几乎沒有大工业,沒有任何規模稍大的独立工人运动,小资产阶级独占統治地位。”<sup>②</sup>

在1849年夏季和秋季,最重要的事情是把还存在的力量

① “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版,第349頁。

② “列宁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436頁。

重行聚集起來。在“1850年6月中央委員會告同盟書”中，馬克思和恩格斯確認：“積極參加了各種運動的盟員都零落失散了，失掉聯繫，通訊地址已經無用，再加之害怕信件被人偷拆，曾經一度無法通信。因此，中央委員會的工作到去年年底為止一直陷於停頓。”<sup>①</sup>

如弗·伊·列寧1902年說，“沒有革命的理論，也就不可能有革命的運動”<sup>②</sup>，馬克思和恩格斯的重新組織共產主義者同盟，正是從革命理論下手。尤其是在那個時候，即1848—1849年整個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的亡命者及其信徒，光靠老一套的革命詞句、狂妄的預告和諾言過日子，在那種情形下，理論工作更加重要。如恩格斯1859年所寫的，馬克思和恩格斯“把亡命者間的論戰場地……讓給了庸俗民主派。他們心滿意足地到處追逐，今天大吵大鬧，明天聯歡，後天又當著眾人的面洗滌自己的脏襯衫；他們在美洲到處求乞，為了分幾文討來的銀錢，立刻重新出醜，——在這個時候，我黨卻因為重新找到了幾分安靜來進行研究工作而高興。我黨有個很大的優點，就是有一個新的科學的世界觀作為理論基礎，闡述這個世界觀已經夠我們忙了……”<sup>③</sup>

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把他們所建立的這種科學的世界觀在工人階級中廣為傳播，對於鞏固工人階級的組織，對於創造一個堅強的無產階級的幹部黨（因為共產主義者同盟應當是這樣一種組織），乃是最重要的條件。1849年4月5日，馬克思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59頁。

② “列寧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36頁。

③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77頁。

开始将他关于“雇佣劳动与资本”的演讲稿作为一系列社评在“新莱茵报”上发表出来。他用下面的话说明这个发表的必要性：“现在，当我们的读者看见了在1848年发展为巨大政治形式的阶级斗争之后，更深切地来研究一下经济关系本身，是合于时宜的，资产阶级的生存及其阶级统治，正和工人的奴役地位一样，都以这经济关系为根据。”①

这样，马克思在他的理论的启导中就从“通过剩余价值揭破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来开始。马克思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所作关于剩余价值生产的规律性的说明，科学地论证了阶级斗争学说，科学地证明了“资本的利益和雇佣劳动的利益是完全相反的”②。由于剩余价值的揭露已经给工人阶级证明，如恩格斯自己所说的，“占取无偿劳动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对工人进行剥削的主要形式”。这个“通过剩余价值揭破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正如恩格斯所说，乃是使“社会主义变成科学”的“两种伟大发现”之一③。

马克思对于“现代社会经济规律”的揭露，给予工人阶级一种争取解放的武器。所以，不掌握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工人阶级政党是不可能发展和巩固的。

当1849年尾马克思和恩格斯再度居留外国时，对他们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把在“新莱茵报”开始的理论启导继续进行下去。在这上面，他们特别依赖于他们的老友和战友约瑟夫·魏德迈耶，魏德迈耶自1848年起就担任“新德意志报”的编辑。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版,第57页。

② 同上书,第75页。

③ 同上书,第2卷,第136页。



“新德意志报”是1848年7月1日起由社会主义出版家勒斯克发行的，它按照“新莱茵报”的榜样，在副标题中标明为“民主派的机关报”。这个报纸的出版通告是1848年6月23日在“新莱茵报”上面登载的，说“它的意图首先是宣扬人民的民主、统治、主权”<sup>①</sup>。

在魏德迈耶和同情所谓真正社会主义者的奥托·柳宁（魏德迈耶的联襟）的主编之下，“新德意志报”进行不妥协的斗争，以实现德国工人阶级的要求：“整个德国应宣告为统一而不可分割的共和国。”在1849年征求订户的启事中，“新德意志报”编辑部宣称：“‘新德意志报’的倾向是在标题中表明了的，并且在新的年度中仍将信守不渝”<sup>②</sup>。最初是在达尔姆斯塔特发行的“新德意志报”，于1849年4月1日迁至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新莱茵报”被封后，马克思和恩格斯立即到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去。1849年5月19日至21日，马克思一家都住在魏德迈耶那里。从马克思和魏德迈耶间的往来书信中可以看出，他们在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的这次会见，除其他方面外，曾谈到通过“新德意志报”支持同盟工作的必要性，谈到马克思的较大著作的发表问题。

继续对工人进行关于经济发展规律的启导，对于同盟的工作具有特殊重大的意义。弗·伊·列宁说：“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就是马克思理论最深刻、最全面、最详细的证明和运用。”<sup>③</sup>马克思的这种经济学说的传播乃是工人阶级对未

① “新莱茵报”，科伦，1848年6月23日第23号，1848年6月24日第24号。

② “前进报”，慕尼黑，1848年12月27日第122号。

③ “列宁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41页。

来行动的最好的准备工作。馬克思大約于1849年間到达巴黎后，写信給魏德迈耶說：“我願从你知道，你认为在怎样的方式下会有可能出版宣传小册子。

我将以一本关于工資的小册子开始，这篇东西在‘新萊茵报’只刊出一个开端。我預备就今天的状况写一个短短的政治导言。你相信勒斯克会同意这个嗎？但他必須拿稿子到手就付稿費，而且要付得多一些，因为我知道这本小册子是有吸引力的，并已有許多人想預約购买……以后勒斯克看到这件事情的好处，我們就可以用这个方式繼續进行了。”在同一信中，馬克思写道：“这几天內我或許会寄給你的报纸一篇关于英国状况的短論。”<sup>①</sup>

这时候在南德意志方面，普魯士軍事法庭已經活动起来了。許多不屈不挠的爱国志士被宣判死刑。在法兰克福，“新萊茵报”的編輯人員和发行者經常在危險之中。在这种情形下，勒斯克已沒有勇气把馬克思那本小册子刊載出来。魏德迈耶于1849年8月28日写信告訴馬克思說，他費了很大的力想給“雇佣劳动与資本”找一个出版者，終于沒有結果。在这封信中还說到：“我們的报纸的命运在本周周末就会被决定了，柳宁和勒斯克周末会在斯特拉斯堡晤面。匈牙利哥尔吉烏（Görgeysche）的叛卖和巴登軍事法庭的禁令，使得我們的处境非常恶化。匈牙利方面的出乎意料的打击引起了普遍的沮丧，我簡直不能說我們的报纸的最后几号对于扭轉这种局面会有多少帮助。柳宁自己就看不到发展，他以为反

<sup>①</sup> J. P. 馬耶：“对馬克思和恩格斯传记的新貢獻”；“社会”杂志，柏林，第7年度，1930年7月第7号，第86—87頁。

动势力的胜利可能是永久的。这就使我现在加倍地欢迎你把你那篇论英国的文章即刻寄来……要是我们的报纸真的非停刊不可，那时我就要试图把威斯特伐里亚小型报纸之一的编辑部搞到手，以便我用这个方式一直奋斗到下次革命——或者直到在某一天得天独厚的监狱中找到不花钱的住处为止。”<sup>①</sup>

基于德国的这种情形，马克思计划将“新莱茵报”作为政治经济评论来出版，并且以自己的资财和朋友的帮助来实行这项计划。1849年8月到12月这几个月中，为了替杂志的财政求援和为了要求给杂志撰稿，他和科伦、杜塞尔多夫、法兰克福、汉堡和巴黎的朋友和熟识的人通了许多信。第一封信是正当恩格斯顺利地由巴登逃到瑞士之后，他从巴黎写给恩格斯的，在这封信中告知了他的计划。这封信大约是1849年8月1日写的，信中写道：

“我已在进行交涉，以便能在柏林发行一种政治经济杂志（月刊），这个杂志的文章必须主要由我们两人来写。”<sup>②</sup>

在这个计划见诸实行以前，还有许多困难要加以克服。马克思被逐出巴黎。他动身亡命伦敦的那一天，即1849年8月23日，写信给恩格斯说：“在伦敦我有积极的希望来创办一个德文刊物。一部分钱我已有把握。因此你务望立即前往伦敦。”<sup>③</sup>

1849年秋季，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的大多数成员和“新莱茵报”的几乎全体编辑人员都到了伦敦。马克思把计划中的月刊的出版作为首要的和急迫的任务向会集于伦敦

① “没有发表过的书信”，莫斯科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第1卷，参看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129页。

③ 同上书，第132页。

的中央委员会提出来了。康拉德·施拉姆，什列斯維希-霍尔斯坦的木匠，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盟员，被伦敦中央委员会委派为杂志的经理（专管业务）。马克思的努力收到了成果：1849年12月中旬，汉堡舒伯特出版公司和经理施拉姆之间订立了承印杂志的合同<sup>①</sup>。

1849年12月19日马克思向魏德迈耶提出请求，要他经常替“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撰写南德意志的报导，并大力协助该评论的推广事宜。同时，施拉姆也写信给魏德迈耶，要求他“在法兰克福方面为评论倡导一种运动”<sup>②</sup>。

除通过书商来销售外，当时还想要组织共产主义者同盟各支部来推广评论的订阅，因此，这个杂志是与同盟的工作，特别是启导工人的工作联系着的。它应该是在德国工人运动中建立一个强大的政治组织的工具。

第一期的稿子原来约定于1850年1月初送达出版者，由于穷困和疾病使得马克思未能如期交稿，杂志的出版因此延迟。魏德迈耶焦急地等待给这杂志作报导。1850年他写信给马克思说：“我一向详细读着‘科伦日报’的广告栏，想从那里面发现死而复生的‘新莱茵报’，但总是枉然，因此我不能在我们的报纸上把通报登载出来。”<sup>③</sup> 马克思旋即通知魏德迈耶，说同盟的伦敦中央委员会正在尽力为这项事业谋划财政上的保证。1850年1月10日中央委员会通过决议，派康拉德·施拉姆到北美去，以便在那里的德语居民中间和流亡者中间推广杂

① “卡尔·马克思，他的详细年谱”，莫斯科1934年版，第79—81页。

② “新时代”，第25年度（1906/07），第2卷，第18页。

③ “没有发表过的书信”，莫斯科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

志的計閱，并組織財政的援助。這項事業的財政保證，馬克思很是擔憂，他還請求魏德邁耶在財政方面尽可能地多想辦法。魏德邁耶于1850年1月16日回答說：“……你不要盤算會有很多的錢，因為在這裡能夠問他們要錢的人實在太少，並且流亡者和過往旅客的救濟也常常大大地叨擾他們了”。不過他表示準備銷售雜誌一百份<sup>①</sup>。

“新萊茵報，政治經濟評論”第一期于1850年5月初出版，印數2,500份。第二期也在这个月出版，印數2,000份。1850年這一年中“新萊茵報，政治經濟評論”共出六期，第五期和第六期是合刊。雜誌的編輯工作主要是由馬克思擔任的。

他把他的“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鬥爭”在這幾期中連續發表出來。如恩格斯在他逝世不幾個月前（即1895年3月6日）在該書新版的導言中所寫的，這部著作是“馬克思初次用他的唯物史觀從一定經濟狀況出發來說明一定時期歷史的嘗試”。馬克思是要拿法蘭西的榜樣，就是說，如恩格斯所確認的，“是要在一個對全歐洲都很緊要而標本的發展中，把所有各個政治事變的內在因果關係揭示出來，從而……把這次政治事變歸因於終究是經濟性原因的作用”<sup>②</sup>。他向工人階級指出，對於事變的判斷，只有以經濟原因為依據，才能使我們對政治可能性作出正確的估計。因此，工人階級對於從1849年開始的狂飆式的經濟發展，就不應忽視了。

正如馬克思于1856年4月14日在倫敦“‘人民報’周年紀念演講”中所說，自1848年以後，“工業和科學力量蓬勃發展起

<sup>①</sup> “沒有發表過的書信”，莫斯科馬克思列寧主義研究院。

<sup>②</sup> “馬克思恩格斯文選”（兩卷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版，第95—96頁。

来,这是人类历史上以前任何时期所沒有想到的。”<sup>①</sup>

发展了的生产力要求生产关系去适应它那已經改变的性质。1884年10月11日恩格斯在給倍倍尔的一封信中写道:

“無論如何,德国的工业革命自1848年以来就开始了。”<sup>②</sup>当时德国的资产阶级虽然人数还很有限,但这个革命也把他們的政治地位改善了。他們現在集中全力来求得經濟上的成功。

“……由于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黄金的流入以及其他事情的結果,世界市场的联系空前扩大,商业空前地繁荣起来;怎样去爭取并保証它所得到的那一部分,便成为重要的問題了。”<sup>③</sup>

1850年夏,馬克思和恩格斯开始坚信:“正是1847年的世界貿易危机才产生了二月革命和三月革命;自1848年中期开始逐漸重新到来而在1849年和1850年达到了全盛的工业繁荣,乃是重又强固的欧洲反动統治所由以促成的动力。”<sup>④</sup>馬克思和恩格斯在改組共产主义者同盟时所遵守的政治策略就是由此而来的。重要的問題在于造就自覺到工人阶级的历史任务的坚定不移的无产阶级的革命骨干。1850年夏,馬克思指出:“新的革命只能随着新的危机而发生。但是新的革命之到来正如新的危机一样,是不可避免的。”<sup>⑤</sup>

但这是意味着,工人阶级不得不准备作长期的斗争。要

① “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版,第336頁。

② “馬克思恩格斯致倍倍尔、李卜克内西、考茨基等的信”,莫斯科1933年德文版,第362頁。

③ 恩格斯:“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参看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5頁。

④ “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版,第97頁。

⑤ 同上书,第207頁。

使这个长期的斗争能达到最后胜利，德国工人就必须是这样的：“他们应认识自己的阶级利益，尽可能迅速地采取自己独立的党的立场，一瞬间也不要让民主主义的小资产者用花言巧语诱惑他们离开无产阶级党独立组织的道路。”<sup>①</sup>

在那种变本加厉日甚一日的恐怖之下，要在德国工人中间进行解释和组织的工作，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任务。“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的出版费了非常大的气力，到1850年秋由于缺乏款项，终于不得不再告中断。马克思的家中陷于极度的穷困。虽然穷困重压着他和他的一家，他还是不倦地替自己的学说作着科学论证的工作。列宁说：“马克思避开侨民小组，主要致力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同时写了些历史著作来阐明自己的唯物主义理论。”<sup>②</sup>他对于这种研究是如何努力，从他1851年6月27日给魏德迈耶的一封信中可以看出。马克思在这封信中描述了自己的研究工作如下：“我通常从上午九点到晚上七点都在不列颠博物馆里。我正在研究的材料，门类是这样多，就是用最大的努力也非还有六个到八个星期不能完成它。而且还常常有俗务纷扰，这是在伦敦人体制下过生活的人所不可避免的。不管这一切，这件事情急需结束了。我们必将有一日不得不强制地停下来。认为智慧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民主派的‘蠢材们’，自然不需要这种努力。他们这些幸运儿为什么要为一些经济的和历史的材料自寻烦恼呢！强干的维利希常常对我说，那是多么简单的事。多么简单！在这些人的混乱的头脑中。这些再简单不过的可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版，第94页。

② “列宁全集”，第21卷，第31页。

拾虫！”<sup>①</sup>

1850年到1852年馬克思和恩格斯所写的著作，总结了1848年到1851年的历史事变，对于工人运动是具有巨大意义的。除上面已经說到的著作“1848年至1850年法兰西阶级斗争”外，还有标题为“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的一系列著名的論文，这些論文是1851年10月到1852年12月在“紐約每日論壇报”发表的，又有1851年12月到1852年3月所写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即“拿破仑第三政变記”。——譯者）。此外，恩格斯的著作“德国农民战争”和“维护帝国宪法运动”，也应该提到。这些著作都可以說是应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的輝煌傑作，第一次用历史事例証明了事件的規律性。馬克思和恩格斯并不限于复述事件的外部过程和揭示那抽象的一般原理，而是从事于具体的现实；他們深入地研究了現存的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他們对于这些事件所作的分析，把原因和关联都揭露出来了。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些著作中借助于历史唯物主义，“指示了把历史作为一个統一的合規律的过程來說明的正确途径，……它使从个别現象和事件或社会生活的个别方面的描述轉为社会历史发展規律的科学說明成为可能，……它使揭露社会生活一切方面的物质根源和把握社会发展过程中全部錯綜复杂和矛盾成为可能。”<sup>②</sup>如列宁所說的，馬克思在所著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里，以1848年到1851年大革命年代的历史經驗做基础，

① 馬克思恩格斯：“給美国人的信”，參看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5頁。

② 巴契晓夫(Batishchev)：“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发展規律的科学”，“新世界”，1950年第4期，第12頁。



回答了关于国家和“怎样以无产阶级国家来代替资产阶级国家的问题”。他问道：“无产阶级对于这个(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的任务是怎样呢？”“……马克思主义在这一段出色的论述里，比在‘共产党宣言’中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在该书中，国家问题还提得非常抽象，还只有最一般的概念和表述。在这里，问题已经提得具体了，还做出了非常确切、肯定、实际而具体的结论：过去一切革命使国家机器更加完备，但是这个机器是必须打碎，必须摧毁的。这个结论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中主要的基本的东西。”所以，马克思在1852年就已断言：无产阶级革命已接近到要“集中一切破坏力量来反对这个行政权力”<sup>①</sup>，即摧毁国家机器。只有通过历史唯物主义才有可能从历史取得教训，并且认识工人阶级的任务。恩格斯在1885年为“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第三版所作的序言中写道：“正是马克思最先发现了伟大的历史进展法则……在这里也是供马克思用以理解第二法兰西共和国历史的钥匙。在本书里，他用这段历史检验了他所发现的这个法则的正确性；虽然时间已过了三十三年，但我们还是必得承认这个试验获得了光辉的成就”<sup>②</sup>。在马克思以及恩格斯1850年到1852年所写的历史著作中，第一次把“人民群众的行动”看作决定性的历史行动，正如列宁说的，它们“以自然历史的精确性”研究了“群众生活的社会条件以及这些条件的变更”<sup>③</sup>。读了这些著作，就会令人信服无产阶级的伟大历史。

① “列宁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92、39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1卷，第222页。

③ “列宁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8页。

史作用，无产階級有力量能够根本改造社会关系，废除人对人的剝削和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卡尔·馬克思在那时就已經拿无产階級专政的必然性来教导工人階級。他在1852年3月5日致魏德迈耶的信中說：“我所作出的新东西就在于証明下列几点：（一）階級的存在仅仅是跟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的；（二）階級斗争必然要引导到无产階級专政；（三）这个階級斗争本身不过是进到消灭任何階級和进到无階級社会的过渡……”<sup>①</sup>

列宁說：“在这一段話里，馬克思非常清楚地指出了……他的国家学說的实质。”<sup>②</sup>根据对各階級的地位和关系的研究，馬克思在1852年已能說出关于国家的最重要的論点。他当时就能說出，工人階級仅仅承认階級斗争是不够的，他們必須像列宁所断言的那样把“承认階級斗争”扩展到“承认无产階級专政”<sup>③</sup>。

历史唯物主义是关于社会发展基本規律的科学。但社会发展的决定性的推动力是生产力。社会生活的一切变化都为生产力的发展所規定。一定的生产关系的性质常常要和生产力发展的状况相适合。列宁說：“研究这个历史上一定社会的生产关系的发生、发展和衰落——就是馬克思經济学說的内容。”<sup>④</sup>

馬克思从1850年起开始悉心研究所搜集的經济資料。关于这件事，他在“政治經济学批判”的序言中說道：“不列

① “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第452頁。

② “列宁全集”，第25卷，第398頁。

③ 同上书，第399頁。

④ 同上书，第21卷，第41頁。

顛博物館中堆积着的政治經濟学史的大量資料，倫敦對於研究資本主義社會是一個方便的觀察地點這一情況，最後，隨着加利福尼亞和澳大利亞金礦的發現，資本主義社會似乎踏進了新的發展階段，這一切決定了我再從頭開始，用批判的精神來透徹地研究新的材料。”<sup>①</sup>他希望完全掌握這些材料，就有可能分析一切政治和經濟事變而分別究明它們的原因。1873年1月24日他在“資本論”第二版跋中，關於他所採用的研究方法，曾這樣寫道：“研究必須搜集豐富的材料，分析它的不同的發展形態，並探尋出這各種形態的內部聯系。不先完成這種工作，便不能對於現實的運動，有適當的說明。”<sup>②</sup>

恩格斯說，無產階級政黨所持理論的“全部內容”都建立在政治經濟學的研究上面，“自從它一出現，科學的、獨立的、德國的經濟學也就開始了”<sup>③</sup>。馬克思從事理論工作並不是退回到象牙之塔里去，而是將理論工作和工人運動的實踐活動結合起來。當這種事情困難重重和幾乎沒有可能時，他仍不斷努力把自已的理論研究的結果介紹給工人，以便鞏固和推進工人運動。威廉·李卜克內西在所著“回憶馬克思”一文中非常生動地描述他甚至在1850—51年亡命中的困難情況下也怎樣使工人們認識馬克思的理論工作：

“在1850和1851兩年當中，馬克思開了一個政治經濟學講習班。他這樣做完全不是出於心願；但在他對一部分朋友講了幾講之後，由於我們的堅持，他終於答應給較多的聽眾講

①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第Ⅳ頁。

②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7頁。

③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第175頁。

授。在这些使一切有幸运参加听讲的人都感到极大愉快的讲授中，馬克思已經基本上闡发了他在‘資本論’中所闡述的理論体系。在共产主义工人教育协会（当时是在磨坊街）的拥挤的大厅（“共产党宣言”就是一年半以前在这里通过的）里，馬克思显示了他具有从事科学普及工作的惊人天才。沒有人比他更痛恨庸俗化，就是說伪造、閹割科学并使它庸俗化；可是也沒有人具有比他更高的明确表述自己思想的才能。語言的明确是由于思想明确，而明确的思想必然决定明确的表现方式。

“馬克思的讲授进行得很得法。中心問題提出时他力求簡短，然后用較长的解释來說明它，竭力避免使用工人們不懂的話。然后他叫听众提問題。如果沒有人发問，他就开始考問。考問的技巧从教育学上来看是十分高明的，沒有一处不懂或誤解的地方能逃过他。

“我曾对他这种技巧表示惊異，有人就告訴我，說他在布魯塞尔德意志工人协会里已經作过讲演了。从各方面来看，他具备了一个优秀教师的一切条件。讲授时他也借助黑板，在黑板上面写出各种公式，包括我們大家全都熟悉的‘資本論’前几頁的公式。”<sup>①</sup>

疾病的纏扰和关于家庭物质生活的經常忧虑，把伟大的經濟著作的最后完成延攔了。1859年，“政治經濟学批判”发表，在序言中就包含着有决定意义的一段陈述，恩格斯写道：“这个原理，不只对于經濟学、而且对于一切历史的科学

<sup>①</sup> “回忆馬克思恩格斯”，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03—104頁。

（凡不是自然科学的一切科学都是历史性的）都是一个起革命作用的发现：‘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决定着社会生活、政治生活以及一般精神生活的过程’，在历史中出现的一切社会关系和国家关系，一切宗教制度和法律制度，一切理论观点，只有了解了与它们相应的每个时代的物质生活条件，把它们从这些物质条件中引伸出来的时候，才能了解。”<sup>①</sup>“资本论”第一卷出版，恩格斯1867年曾以如下的话表示祝贺：“自世界上有资本家和劳动者以来，没有别的书比我们当前这本书对于劳动者更重要了。我们今日的社会制度全部，是建筑在资本和劳动的关系这一个轴心上。对于这种关系，这还是第一次的科学的说明……”<sup>②</sup>

1849年的失败曾使工人阶级陷于沮丧、混乱，迷失方向，组织瓦解，马克思用他的理论工作不仅帮助工人阶级把这些情形克服了，而且还给他们的斗争提供了一种锐利的武器。

---

①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76页。

② “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001页。

## 二 1850年同盟的发展

1848年革命中成立的工人民主协会，給有阶级意識的无产者的一个巩固而可靠的核心的形成奠下了基础，这些无产者是一向忠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

普魯士軍隊在南德意志获胜后，反动势力便傾其全力来消灭工人协会（或譯工人联合会。——譯者）。1849年6月29日，普魯士国王下了一道命令，令所有协会将它們的会章呈报警察厅，每次集会都要报請核准。科伦的工人协会，始終是最强有力的工人协会。在这个命令限制协会的合法活动之前的最后一次总集会即1849年6月18日的大会上，主席雪茄烟工人勒泽尔通告說：由于“反革命的暂时胜利，致使参加政治协会的人数减少”，协会的九个分会应该縮減为五个。中央领导机关是由各支部领导机关組成的。为了适应这种环境而能順利地进行工作，在1849年7月29日工人协会的一次集会上作出决定，将协会改为讀書会或教育协会。但科伦工人协会仍然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一个积极的中心。由于科伦工人协会或科伦工人教育协会的活动，結果，1849年7月18日所选出的理事会有三个人（勒泽尔、賴夫和奧托）坐在1852年科伦共产主义者审訊的被告席上<sup>①</sup>。

在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1849年事件最初也使工人們气

<sup>①</sup> 参看布呂格爾(Fritz Brügel):“科伦工人协会的历史”，“社会”杂志，柏林，第7年度，第1卷，1930年，第112—116頁。

餒。1850年1月16日魏德迈耶在給馬克思的一封信中，描述了工人运动发展的一幅悲惨景象：“就工人的組織而言，情形很糟；我相信，在这一方面几乎是沒有比这事更无結果的。我所建立的工人协会，規模很小，并且完全是由鞋匠和裁縫組成的，至于其他各业，都陷溺在职业公会的垃圾之中。更广泛的一种組織几乎已不再存在；相反地，迄今仍繼續不断的政治迫害却招致了最恶劣的組織瓦解，要想再联系起来，将很費力”<sup>①</sup>。

关于魏德迈耶答应在工人中間銷售的那一百份杂志，他在三个月中銷去了大約半数<sup>②</sup>。但在1850年6月15日給馬克思的一封信中却表示他对法兰克福工人协会的发展已充滿希望：“要在小资产阶级的讀者群众中間（可惜这里的工人多半要算作这种群众）推銷‘杂志’，此外沒有任何有效的做法。甚至那少得可怜的定购数目也有一部分差不多要撤回了。不錯，在那越来越多的組織起来的工人协会中，我們漸漸获得了稍为宽广的地区；不过也只是漸漸获得的。”<sup>③</sup>

魏德迈耶是說，在萊茵地带的工人协会中，同盟又开始穩固起来了。在“1850年3月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中，馬克思和恩格斯对德国的盟員发出这样的指示：“工人党必須尽量有組織地、尽量一致地和尽量独立地行动起来……”<sup>④</sup> 这个指

① “沒有发表过的书信”，莫斯科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

② 在1850年5月24日魏德迈耶給馬克思的沒有发表过的信中是这样說的：“虽然費了很大的力，我在这里沒有能够銷去六十本……”，莫斯科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

③ “沒有发表过的书信”，莫斯科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

④ “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1卷，第85頁。

示，分析了德国的政治形势并指明了各个阶级间的对比关系。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个指示中作出结论说：“不应再度屈身充当资产阶级民主党的随声附和的合唱队，而应该努力设法建立一个秘密活动和公开活动的独立工人政党组织，以与那些正式的民主党人并立，并且应该使自己的每一个支部变成工人联合会（即工人协会。——译者）的中心和核心，在这种工人联合会中，无产阶级的立场和利益问题应能进行独立讨论而不受资产阶级影响。”①

列宁关于“1850年3月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这样说道：“马克思的思想是这样的：我们，即1850年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没有组织起来，我们在革命的第一个时期遭到了失败，我们完全作了资产阶级的尾巴；我们应当独立地组织起来，一定地、无条件地、绝对独立地组织起来，——不然的话，在加强了自己组织的强大的小资产阶级党将来胜利时，我们还会当尾巴。”②

这个“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对于从思想上和组织上巩固共产主义者同盟是有决定意义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派伦敦中央委员会会员皮鞋匠亨利希·鲍威尔把“告同盟书”带到德国去。亨利希·鲍威尔先到科伦。1851年8月1日雪茄烟工人勒泽尔在科伦对预审官说到这一件事：“一个密使，他的名字我叫不出，于上年三四月间带来了‘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密使奉命遍游德国，在科伦仅留一天；他把‘告同盟书’分作六段带在身上，急忙分给可以信赖但并不都是同盟会员的六个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1卷，第89页。

② “列宁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437页。



同的人把它抄下来”<sup>①</sup>。这样，“告同盟书”很快就不仅为同盟会员所知，而且工人协会中的人知道了。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断定：“亨利希·鲍威尔这次出使得到完全的成功。这位矮小快活的皮鞋匠是个天生的外交家。他把一部分已离开工作的，一部分独立进行工作的以前的盟员们，重新集合在一个积极的组织内；就中他把‘工人兄弟会’当时的领袖们也吸收进来了。”<sup>②</sup>所以恩格斯指出，1850年“工人兄弟会”的领袖们之参加同盟活动，值得特别重视。这么一来启导工作就进入了一向走工联主义路线的工人协会了。由于1850年夏季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一方，英国宪章派领袖朱利安·哈纳以及法国布朗基主义者维底尔和阿丹姆为另一方，本着“告同盟书”的精神达成了协议，共产主义者同盟现在实际发生了革命工人政党的核心的效力。协议的第一条说：“同盟的目的是打倒一切特权阶级，使这些阶级服从无产阶级专政，将革命永久持续下去，一直到共产主义的实现，共产主义是人类结合的最后的组织形式。”<sup>③</sup>

同盟的工作在德国大有进展。恩格斯在所著“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一文中就1850年上半年同盟的发展这样写道：“同盟在各个工人团体、农民团体和体育团体中所起的领导作用，已较1848年以前大得无可比拟了，所以在1850年6月印出的最近一次告各支部书已经可以指出：‘周游德国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代表波恩大学生叔尔茨（后来他在美国作过部

① 布兰登堡地方档案馆，波茨坦，第30目，第94项，R字，第208号，关于科伦雪茄烟工人勒泽尔，1851—1857。

② 参阅“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第350页。

③ “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第2年度，1928年3月，第144—145页。

长)发现一切能干分子都已集中在同盟手中了””,恩格斯結束他的叙述說:“同盟无疑是在德国有意义的唯一革命組織。”<sup>①</sup>

魏德迈耶在法兰克福遵照“1850年3月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的指示,做到了把企图以煽惑性的革命詞句使工人們和小资产階級运动合并起来的代理人布伦(Bruhn)开除出同盟。1850年6月15日他写信給馬克思說:“像布伦这类革命制造家并不缺少,所缺少的是明确地意識到他們实在对革命要如何着手的人。”<sup>②</sup>

“1850年6月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中說到:“同盟在德国的主要中心是科伦、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哈瑙、美因茲、維斯巴登、汉堡、息韦林、柏林……”。法兰克福及其附近的其余城市被列于除科伦外最优先的地位。同时还說到:“薩克森、法兰克尼亚、黑森和拿騷的工人和雇农的协会組織大部分也在同盟的領導之下。”<sup>③</sup>

这里所举“黑森和拿騷的工人协会”是归魏德迈耶所領導的法兰克福工人协会領導的,所以是在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可靠盟員領導之下。法兰克福区部是同盟的最有力和最活跃的区部之一,魏德迈耶就是属于这个区部,并被选为区部主席。区部主席直接和伦敦通訊<sup>④</sup>。从后来同盟盟員的陈述可以知道,魏德迈耶曾在1850年夏在德国西部和南部,即在黑森,就中在吉森,和在南德意志,特别是在紐伦堡,建立了共产

① “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第350—351頁。

② “沒有发表过的书信”,莫斯科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

③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63、364頁。

④ 布兰登堡地方总档案馆,波茨坦,第30目,第94項,R字,第208号b。

主义者同盟的新的小组乃至支部。他甚至在法兰克福组织了一次非法的会议，代表是从吉森、美因兹、曼海姆、哈瑙和西德意志的其他一些地方派来的<sup>①</sup>。

同盟的美因兹支部是在勒斯纳的领导下，勒斯纳后来成为伦敦第一国际总委员会的成员。他受法兰克福的训令，曾游历伦堡，以便改组那里的支部。关于美因兹支部，勒斯纳说道：“我们组织得那样好，在一小时内就可以把传单充斥于美因兹城。警察想要捉住一个散发传单的人也做不到”<sup>②</sup>。

官厅开始用解散工人协会，驱逐它的成员的办法来反对同盟，他们尽力用这种方式来制止革命的宣传。1850年10月13日魏德迈耶自法兰克福写信给马克思说：“近来我忙得很，在很晚的时候，协会所要做的事情还多着呢——因为，由于盲目的黑森人最近所受到的惩罚，我们区的工人协会大部分被解散了。因此，在这时候，对于鼓动，与其说有害，不如说有利。”<sup>③</sup>

工人协会的主席沙佩尔在1850年7月3日就已经从维斯巴登写信给魏德迈耶道：“内閣不准我完全用三月革命前那样的作法授课以及人们无所不用其极地虐待我的情形，你或许已经听到过了。官僚、民主派、僧侣等对我的一致愤怒，主要是由工人协会引起的，我是协会的主席，它已经发展到二百来个会员。在这个选侯国的首府，工人协会是有些令人恐怖的东西。一想起工农群众就会使那些人毛骨悚然，现在大家都看

① “国际的历史”，M. B. 著，莱比锡1872年版，第53—54页。

② 勒斯纳：“社会民主运动六十年”，伦敦1907年版，第23页。

③ “没有发表过的书信”，莫斯科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

得最清楚，就是这件事情使得想在这里挥霍他们的金钱的富人感到这个美丽的选侯国首都已经变为可怕的了——因此我不得不离开此地。”<sup>①</sup>

对于法兰克福和周围一带共产主义者同盟和工人协会的领导和组织者魏德迈耶，在1850年这一年中情况越来越危急。当预料到法兰克福的联邦议会准备重新采取行动，要把普鲁士所“光荣地”（像魏德迈耶说的）开始的德国反革命“快要进行到底”时，他在1850年6月15日给马克思的信中提到：“我想知道，此后把我的旅杖移向何处。”魏德迈耶经考虑后，决定转入地下继续进行同盟的工作。1850年7月3日他给马克思的信中曾谈到这个意向：“我已经请求从7月1日起解除我的编辑名义，让我此后只作一个撰稿人，实际上我现在也只处在这样一个地位。柳宁不赞同这样办；而要完全脱离，在今天情况之下就等于完全绝望，这是不可不再三思索的。除此以外，我不愿意放弃我在这里的其他作用。”<sup>②</sup>从这封信可以推断，魏德迈耶虽然由于他在法兰克福的“其他作用”，就是说在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在工人协会中的作用，不能充分发挥他的编辑活动，可是他给“新德意志报”的影响对于运动还是大有裨益。马克思本人就得到机会，将“共产党宣言”的一些重要学说作了简短的注释。奥托·柳宁发表了一篇论“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的文章。马克思借这篇论文为缘由来发表一个简短的声明，他引用了“共产党宣言”和他登在“评论”上的一些文章的话来纠正柳宁的编者按语，

<sup>①</sup> “新时代”，第25年度（1906—1907），第2卷，第53页。

<sup>②</sup> “有发表过的书信”，莫斯科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

声明說：他不仅主张“工人階級的統治和專政”，而且还主张“根本废除階級的差別”。这篇声明于1850年7月4日发表于“新德意志报”。在1850年7月，一个德国报纸，能够让馬克思本人用这样一个声明出来說話，这一个勇敢的行为实在是可欽佩的①。

“新德意志报”的被封閉再也不用等待多久了。1850年12月13日，該报就被法兰克福市参議會封閉。同时，編輯部也随即“因侮辱法兰克福人和友好的政府”而被驅逐。1850年12月14日，“新德意志报”出了最后一号②。法兰克福市参議會——法兰克福资产階級、特别是銀行家罗特希尔德的代表，准备在城内重新欢迎旧时的反动的德意志联邦議會。1850年5月10日，奥国已向德国所有各邦发出邀請，要他們再派代表到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参加德意志联邦的机关。1850年12月就已經看得很清楚，1851年是以这个机关的复活为标志，这个机关在迫害一切民主和进步企图方面，在1848年以前就已經在德国有卓著成績③。

① 参看“卡尔·馬克思，他的詳細年譜”，莫斯科1934年版，第91頁。

② 参看左尔格：“約瑟夫·魏德迈耶”；“先驅者”，插图通俗年鑑，紐約1897年版，第55頁；还参看路德維希·薩洛蒙：“德国报业史”，奥尔登堡和萊比錫从1900年到1906年，卷3，第611頁，和怀特·法伦廷：“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和1848—1849年革命”，斯图加特1908年版，第487頁。

③ 参看馮·波辛格尔博士出版的“1851—1859年联邦議會中的普魯士”，普魯士王国駐联邦議會代表处文件集，第一編，1851—1854，1882年萊比錫版，第3、4頁。

### 三 同盟中央委员会迁往科伦

1850年夏天，馬克思和恩格斯在伦敦通过透彻的科学研究，闡明了經濟发展和政治发展的关系問題，从而对工人阶级的状况和任务作出了新的論断，而这时，像金克尔、維利希等貌似激进派的民主小資产者和小資产阶级革命派的革命預告却甚囂尘上。1869年恩格斯在一篇关于馬克思的文章中写道：“那时大陆各国的流亡者的精华全都会集于伦敦。成立了各式各样的革命委员会、联合会、徒有其名的临时政府，进行了种种爭論，吵鬧不休，曾經参加过这些爭吵的先生們現在回顾这个时期，无疑会把它看作他們一生最倒霉的时期。”<sup>①</sup>小資产阶级革命派显然不理解对 1848 — 1849 年革命失敗原因的分析。他們提出了革命綱領，在其中首先向小資产阶级許願。詩人哥特弗里德·金克尔提出了一項革命公債計劃，冠冕堂皇地称之为“德意志国家公債”。发出記有捐款數目的收据，其中写明借助公債建立起来的德意志共和国將承担偿还的責任。維利希参加推銷这个革命公債。侨居英美的 1848 年流亡者簡直全都被金克尔、維利希等人卷入革命公債的喧嚷中。

在維利希及其信徒的这种革命儿戏的基础上，有战斗力

<sup>①</sup> 恩格斯：“卡尔·馬克思”；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論德国史”，第 2 卷，第 857 頁。

的独立的工人政党是建立不起来的。革命儿戏对同盟是一种危险，1850年9月15日維利希-沙佩尔集团就这样造成了分裂。关于这一点，列宁写道：“当1848—1849年革命时代已经结束，馬克思便反对任何玩弄革命的儿戏（反对沙佩尔和維利希一流人物），要人們善于在似乎是‘和平地’准备着新革命的那个新阶段进行工作。”①

馬克思在伦敦同盟中央委员会会议上說明了維利希-沙佩尔集团实行分裂的原因，馬克思的这个論証同时还包含共产主义者同盟今后的工作方針：“少数派用教条主义观点代替批判观点，用唯心主义观点代替唯物主义观点。少数派不是把现实关系，而仅仅把意志看做革命的动力。我們对工人說：不仅为了改变現存条件，而且为了改变自己本身，使自己具有进行政治統治的能力，你們或許不得不再经历十五年、二十年、五十年的內战和国际冲突，而你們却相反地对工人們說：‘我們必須馬上夺取政权，要不然我們就躺下睡大觉。’我們特別向德国工人指出德国无产階級不够成熟，而你們却非常粗劣地向德国手工业者的民族感情和等級偏見阿諛逢迎，当然这样做是比较受欢迎的。正像民主派把人民这个詞变成圣物一样，你們則用无产階級这个詞来玩这套把戏。你們像民主派一样，用关于革命的空話代替革命的发展”②。

維利希-沙佩尔集团現在完全走上了小資产階級的即庸俗民主派的道路，他們的活動正如小資产階級民主派的活動一样，只限于拚命大吹大擂据說即将到来的革命。

1850年9月15日伦敦中央委员会会议还以六对四票通过

① “列宁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57頁。

②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465頁。

如下決議：

“1. 中央委員會由倫敦遷到科倫，委托科倫區部建立新的中央委員會。

2. 共產主義者同盟章程宣告無效，委托新的中央委員會草擬新的章程。”<sup>①</sup>

這個決議在1850年9月下半月由店員威廉·豪普特帶交同盟科倫支部的領導。豪普特從倫敦出發，返回故鄉漢堡市。

（豪普特於1851年5月被捕後成為叛徒。）

1848—1849年的“新萊茵報”編委亨利希·畢爾格爾斯，早在豪普特到達的第二天就往法蘭克福寫信給約瑟夫·魏德邁耶，告訴他這個事件和決議，這證明同盟科倫區部領導同法蘭克福區部領導的密切合作<sup>②</sup>。

魏德邁耶獲得這個消息後（除科倫的報告外，他還從倫敦得到直接的通知），在1850年10月13日寫信給馬克思說：“同盟的分裂無論如何有害，還達不到恩格斯所似乎為之擔心的

① 拉都斯-森科維奇：“共產主義者同盟史（1850年9月—1851年8月）”，蘇聯，“歷史問題”雜誌，1948年第11號。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615頁。

② 布蘭登堡地方總檔案館，波茨坦，第30目，第94項，R字，第208號b；柏林警察總局文件，關於因雪茄煙工人勒澤爾向政府供述而進行的揭發共產主義者團體的審訊，1848—1853年。雪茄煙工人彼得·格爾哈特·勒澤爾在科倫共產黨人案件中被判決後，亦即1853年12月和1854年1月受審時曾供述這樣的細節，不過那時已不能造成什麼損害。勒澤爾在預審時也曾提供關於共產主義者同盟的材料，不過他拒絕指名道姓。正是勒澤爾作為工人在牢獄中受到十分殘酷的迫害。但是他沒有變成警察偵探。參照布蘭登堡地方總檔案館，波茨坦，第30目，第94項，R字，第208號，柏林警察總局文件，關於科倫雪茄煙工人勒澤爾，1851—1857年。



程度：迁移中央委员会是你们能够作出的最好的决议，在这里到处都得到完全一致的赞同。沙佩尔对他的影响的估价无疑有些过高……”<sup>①</sup>

奉承工人和帮工，对他们高谈阔论革命指日可待，这比同他们进行认真的讨论，使他们领会马克思的科学的学说，当然容易得多。斯大林说：“不用说，如果就思想的传播来讲，那末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即工联主义的意识，比刚刚走了几步的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传播起来要容易得多，对自发工人运动的影响也要广泛得多。”<sup>②</sup>

魏德迈耶在同一封信中报告了他在这方面所获得的组织工人的经验：“既然连吸收工人群众加入联合会都做不到，至少不能把他们吸收到认真地讨论问题的联合会，那末，人们又怎能影响工人群众呢？在我们这个小小的但极坚强的联合会内，组织认真的讨论，并不需要我费什么气力……”<sup>③</sup>

还有迹象表明：1850年底和1851年初，工人阶级的优秀代表开始对口头革命家、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感到失望。著名的工人阶级领袖显然认识到，必须坚持1850年3月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所说的工人联合会的独立性。这种认识在1830年至1848—1849年的革命战士、后来第一国际德国支部组织者约翰·腓力普·贝克尔于1851年2月6日自日内瓦寄往巴黎的信件中十分明显地表现出来。信中说：“我确实已尽自己的最大努力去做，深入下层，重新恢复我同德国工人联合会的联

① “没有发表过的书信”，莫斯科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

② “斯大林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86页。

③ “没有发表过的书信”，莫斯科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

系,等等。而我认为这是一切組織工作中最基本的东西。最优秀的民主派的团体在通常的情况下簡直是悬在空中,而不着地就不能扎根。人們离开工人还能有什么希望呢。斗争是专为他们进行的,因此只有通过他们去进行!”<sup>①</sup>

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工作集中在这个“最基本的东西”上面。同盟科伦支部着手执行伦敦中央委员会最近的決議,即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指示。它在这方面得到在法兰克福的魏德迈耶的全面支持。在“新萊茵报”被禁止出版以后,他比以前更努力从事同盟的工作。馬克思和恩格斯的久經考驗的朋友約瑟夫·魏德迈耶常常赴科伦以便同新的中央委员会商談同盟的工作,应估計他的这些活动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他第一次出差到科伦是紧接着“新萊茵报”在1850年12月被禁止之后,这从現在尚未发表的魏德迈耶于1850年12月28日給馬克思的信可以看出来<sup>②</sup>。

新中央委员会在1850年12月1日告同盟书中首先面向各个同盟支部。这个告同盟书首先告訴同盟支部維利希-沙佩尔集团的分裂行为,并表示反对这个集团的这种行为。这个告同盟书有力地反对了这个集团宣布“抛弃一切理論工作”的立场。告同盟书清楚地說明:这个集团以此表明它絕對不能引导工人階級走向胜利,这样的一种立场最后必然导致对工人階級的背叛。所以告同盟书說:“因而这也是十分自然

① 布兰登堡地方总档案馆,波茨坦,第30目,第94項,W字,第188号,柏林警察总局文件,关于柏林国外週报,第2卷,1852年。附言,这封信在巴黎赫尔费尔那里被沒收了。

② “沒有发表过的书信”,莫斯科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这封信中有“从科伦返期旅行回来”的字样。

的，这些人看来好像唯有他们才代表‘纯粹的无产阶级’的利益，而在他们以民主社会主义委员会的名义与法国人、波兰人和匈牙利人共同发布的最近宣言中大吹大擂的不过是革命词句，他们自命为小资产阶级社会民主共和国的先鋒战士。他们就用这个办法使无产阶级甚至在运动时期倒退到旧的非政治的立场：再叫它为别的阶级的利益而斗争，以便过后骗取它的胜利果实。”

可见，科伦新的同盟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是从列宁后来概括为“没有革命的理論，也就不可能有革命的运动”这种認識出发的。它把馬克思和恩格斯草拟的“1850年3月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称为同盟今后工作的基础。关于这一点，它說：

“我們再說一遍，我們要奉行的政策是确定了的；它包含在今年伦敦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告同盟书中。因此，我們……建議各区部和支部討論这个告同盟书。”它特別指出了表明“无产阶级政党对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关系”的地方。接着要求“凡是还存在着工人联合会的地方，工人联合会应討論告同盟书中有关无产阶级立场部分的内容”。

在描述同盟的情况后，告同盟书作出結論，“对同盟的利益迄今追求不力，不久以前籠罩德国的总萧条也給同盟的发展和巩固带来极不利的后果，特别是宣传工作不可饒恕地被忽視了”。告同盟书认为同盟今后工作成功的保証是：“我們具有把我們团結在一起的坚强的組織和坚强的党綱，这是小资产阶级民主党所沒有的东西。”

告同盟书还报告已派出了四个特使去說明情况，去建立中央委员会和同盟各支部之間更好的組織关系。第一个特使

是魏德迈耶。这从迄今尚未发表的通信以及后来勒泽尔的供词可以看出来。魏德迈耶出使南德，首先到纽伦堡和班堡。他建立了新的支部，归法兰克福区部领导。关于这一点，1850年12月1日告同盟书说：“总之，一切都说明，同盟在南德所找到的还是很不牢固的据点，因此我们已把那儿名义上还存在的  
所有支部暂时划归法兰克福区部，委托它专门研究和摸清南德的情况。”①

据告同盟书说，第二个特使去到莱比锡区部，也在柏林停留了一个短时期。这个特使是化学家奥托，然而事实证明他是不称职的。因此诺特容同样奉命出使柏林和莱比锡，他在1851年5月10日被捕。诺特容在柏林为共产主义者同盟进行的活动，是从他被捕时随身带着的两封信中获悉的。第一封是科伦中央委员会委员亨利希·毕尔格尔斯于1850年12月27日给诺特容的信，他在信中对诺特容柏林之行表示高兴，并指出柏林工人对同盟的意义：毕尔格尔斯在信中写道：“我们很高兴您能潜入柏林，我们深信您会努力工作的，因为我们了解自己人……机器制造工人被称为柏林最优秀的工人，您也要访问他们……”②在诺特容身上搜出的第二封信中科伦盟员贝

① 1850年12月1日告同盟书载于对科伦被告第一次起诉书第6—9页。历次告同盟书都被收入起诉书中。在起诉书中发表的1850年3月和1850年6月告同盟书的原文，同恩格斯于1885年出版的这两次告同盟书的版本一致，因此必须认为所转载的1850年12月1日告同盟书也是真实的。原文同拉都姆-森科维奇在“共产主义者同盟史”（苏联“历史问题”杂志1848年11号）一文所转载的1850年12月1日告同盟书的内容也是一致的。起诉书藏德国中央档案馆第二馆，麦塞堡，第77目，第505项，第16号，关于1851年在科伦发现的共产主义和革命的阴谋活动的文件，第2卷。

克尔警告他提防警察的追捕：“想您一定知道，辛凯尔迪（柏林警察总监。——作者）已把您作为政治嫌疑犯列入他的黑名单中……只要您稍为露面，您就会被人识破。因此要小心谨慎，避免参加所谓民主党的宴会，您可以十分巧妙地避免同他们来往，通过别人做您要作的工作。不暴露自己，这是对党负责……”③

在第一封信中提到的机器制造工人被公认为有阶级觉悟的工人。因此，他们不得不遭受普鲁士警察当局种种阴谋诡计的陷害，著名的作家卡尔·奥古斯特·瓦伦哈根·馮·恩色1851年3月9日在他的日记中记下了下述值得注意的当时的典型事件：1851年3月8日，机器制造工人在申豪斯门外某处同许多客人举行舞会。“在跳舞时，帕茨克上尉带领一队巡警闯进来捣乱，把妇女赶到一个特别的房间里，男人们全部被捕，半夜被押到警察局，登记姓名，早上三四点钟才被释放，一百八十多人！”④

② 维尔穆特和施梯伯：“十九世纪共产主义者的阴谋”。奉官方命令根据法院的和警察的有关文件写成，供德意志联邦的各邦警察当局利用。A. W. 海因印，柏林1853年，第1卷，第103—133页；还可参阅起诉书第43页。

③ 维尔穆特和施梯伯：“十九世纪共产主义者的阴谋”。

④ 卡尔·奥古斯特·瓦伦哈根·馮·恩色：“日记”，第8卷，苏黎世1865年，第93页。瓦伦哈根·馮·恩色1851年6月4日的日记在这场阶级斗争中明确地站在劳动人民这一边。他写道：“我在1848年以前可算是人民的朋友、自由的朋友，但不是真正的民主主义者；只要看到一切来自上面的政治的、公民的幸福，我就心满意足了，而且只是期待和要求上面赐予幸福。可是1848年使一切都改观了，事实证明人民是高尚的伟大的，王侯和统治阶级是下流的、懦弱的和不守信义的。此后就再也不存在豺狼能长好心肠的希望。此后就肆无忌惮地使用凶残的暴力，使用可耻的阴谋诡计，此后就存在着非打到底不可的战争。”

告同盟书提到第三个特使的任务是“出使莱茵省,那里,包括法兰克福区部在内,是到现在唯一的还有坚强组织和积极宣传活动的地方”。总共拥有11个支部的科伦区部和法兰克福区部,告同盟书对盟员称之为“模范和榜样”<sup>①</sup>。告同盟书提到的接受这个任务的第三个特使,姓名不详。但是不容置疑,在莱茵省同盟的建设上,最大的功劳应归于同科伦区部密切合作的约瑟夫·魏德迈耶。魏德迈耶常常出差到科伦去,不仅如此,勒泽尔报告,他在1850年12月间还在魏德迈耶那里待了四天,以便了解他去视察各地同盟支部的结果<sup>②</sup>。

告同盟书还谈到了第四个特使,他应出使“德国北部和东北部乃至西里西亚”。告同盟书未能报告此行的情况。据后来勒泽尔的供述,诺特容曾奉命出使威斯特伐里亚和北德<sup>③</sup>。

同盟科伦支部遵照1850年9月15日在伦敦所作的决议,还草拟了新的章程,附在1850年12月1日告同盟书后面。关于同盟的目的,该章程第一条规定:“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目的是以宣传和政治斗争的一切手段达到破坏旧社会,在精神上、政治上和经济上解放无产阶级和实现共产主义革命。在无产阶级斗争必须经过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同盟始终是整个运动的利益的代表者,同样,它始终力求把无产阶级的一切革命力量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并把它们组织起来;它是一个秘密的组织,这个组织在无产阶级革命未达到最终目的前,不得解散。”<sup>④</sup>

① 起诉书,第7—8页。

② 参阅布兰登堡地方总档案馆,波茨坦,第30目,第04项, R字,第208号。

③ 同上。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626页。中文版在“破坏旧社会”后面,有“——推翻资产阶级”。——译者

关于这一点,应当指出,这个广泛的提法并不能说明起草人的观点明确。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制定的1847年12月8日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第一个章程中,同盟的目的表述得简短明确。从告同盟书的一些提法也可看出:在科伦新中央委员会里坐着毕尔格尔斯这样的人,他喜欢卖弄漂亮的,或如恩格斯所说的,深奥的词句。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科伦新中央委员会最初的一些措施一般说来是满意的。1850年12月19日燕妮·马克思写信给恩格斯说:“科伦的人们驱逐维利希及其同伙的宣言(即新中央委员会关于维利希分裂同盟的告同盟书。——作者),连同新章程和传单等件,昨天公布出来了。科伦人这一次分外地坚强、活动,并且完全坚决地对抗这一群卑鄙的人。”<sup>①</sup>

据了解,新的中央委员会最初由同盟科伦支部的三个委员组成:医生罗兰·丹尼尔斯博士,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亲密朋友,1855年在狱中患肺病死了;雪茄烟工人彼得·格尔哈特·勒泽尔,1848—1849年“新莱茵报”编委亨利希·毕尔格尔斯,后来成为自由进步党党员和国会议员<sup>②</sup>。谈到罗兰·丹尼尔斯医生时,法兰茨·梅林说他好像是“科伦中央委员会的真正首脑”,至于亨利希·毕尔格尔斯,梅林说“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到他时不无轻微的讽刺”<sup>③</sup>。

雪茄烟工人勒泽尔一向不大引人注目。他从1849年以来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第1卷,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44页。

② 参阅拉都斯·森科维奇写的上述论文。

③ 马克思:“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柏林迪茨出版社1952年版,第162—163页。

就是科伦工人教育协会主席和德国雪茄烟工人协会副主席，德国雪茄烟工人协会是德国第一批全国性的有組織的工会之一。勒泽尔对加强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工人阶级中的影响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因此，他后来在所谓叛国案中也 被当作最危险的分子之一来处理，被判了六年徒刑。

勒泽尔于1850年初加入共产主义者同盟。后来，在1851年8月1日，他受科伦预审推事审讯时宣称：“我不否认曾利用工人教育协会，以便在其中灌输共产主义思想，一般是通过报告来广泛传播主义。”<sup>①</sup>

他作为德国雪茄烟工人协会副主席所从事的活动，也同他作同盟中央委员所从事的活动有联系。1851年4月，即被捕前不久，勒泽尔视察了莱茵省雪茄烟工人联合会。此行极为重要，因为三月底哈瑙联合会有许多会员被捕，要被提交法庭审讯。当时急需接济家属，以及把联合会重新建立起来<sup>②</sup>。

科伦法庭在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终结之后向普鲁士司法大臣和普鲁士内政大臣所作的关于被告的报告说：“就我通过审讯有机会认识被判决者而言，我认为勒泽尔是其中的首恶……他从1848年至被捕时为止，几乎是专门从事同盟的活动，而且在其中表现得坚毅顽强；在另一方面，他虽然只受过很

① 布兰登堡地方总档案馆，波茨坦，第30目，第94项，R字，第208号，柏林警察总局文件，关于科伦判雪茄烟工人勒泽尔，1851—1857年。

② 参阅勒泽尔于1851年3月31日给拉萨尔的信的副本，勒泽尔固然同拉萨尔有联系，但是对他并不信任，因此不使他接近共产主义者同盟；布兰登堡地方总档案馆，波茨坦，第30目，第94项，R字，第208号。关于不信任拉萨尔的问题，还可参阅梅林在马克思“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一书中所写的序文，第165页。



少的教育，但是他并不乏在工人中树立威信和造成巨大影响的才能。”

关于毕尔格尔斯，这个报告接着说：“毕尔格尔斯是个有相当教养的人……他似乎以为自己，特别是他的口才很了不起，他对自己的才能估价极高；他也許曾經指望在所梦想的在德国全部国家关系的改造中能够占显要的地位。”<sup>①</sup>

1851年可能还有赫尔曼·貝克尔博士加入科伦同盟中央委员会，他后来成为国家自由党的科伦市长和普魯士上議院議員；至少他同科伦中央委员会有密切的关系。据勒泽尔的供述，大家并不一致同意接受貝克尔入盟<sup>②</sup>。关于貝克尔，馬克思于1852年12月7日給魏德迈耶的信写道：“……他的理論修养很差，但是他的个人野心却頗强烈……”<sup>③</sup>他在叛国案中的表現是不符合共产主义者的立场的。貝克尔是从小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出身的。1851年3月31日“黑森大公国内閣致大公美因茲政府委员会”的公函把貝克尔列为小资产阶级，这些小资产阶级可以称为“正在进行的民主机构改組的主要支柱”<sup>④</sup>。

貝克尔自科伦“新萊茵报”被禁止后出版了“西德意志报”，他力图把該报說成“新萊茵报”的后继者。他向

① 布兰登堡地方总档案馆，波茨坦，第30目，第94項，R字，第208号。

② 參閱布兰登堡地方总档案馆，波茨坦，第30目，第94項，R字，第208号。

③ 參閱馬克思：“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柏林迪茨出版社1952年版，第145—146頁。

④ 布兰登堡地方总档案馆，波茨坦，第30目，第94項，B字，第321号，柏林警察总局文件，关于“西德意志报”前出版者赫尔曼·亨利希·貝克尔博士先生，1851年。

“新萊茵報”的訂戶提出，給他們“免費奉送‘西德意志報’至7月1日，作為已付的一季訂費的補償”<sup>①</sup>。然而“西德意志報”是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的報紙，不能同“新萊茵報”相提並論。魏德邁耶1849年6月2日在“新德意志報”上發表了由馬克思起草的聲明：上述被禁止的“新萊茵報”的編輯否認同在科倫以“西德意志報”名義出版的小報有任何共同之處<sup>②</sup>。貝克爾仍沒有放棄給他的小報搞個名堂的企圖。他特別努力拉盟員入編輯部。1850年3月，亨利希·畢爾格爾斯要求馬克思給他“黨關於‘西德意志報’政治領導的指示”，他打算進入該報的編輯部。但是馬克思勸他不要去<sup>③</sup>。

拉薩爾當時就已經想找機會在政治運動中顯一下身手，他早已給畢爾格爾斯寄去了一些論文。畢爾格爾斯於1850年4月11日把這些論文寄了回去，並附言“該報至今不變的立場”使他不能參加編輯部，他補充說：“如果我決定為該報寫稿（這並非不可能，不過這是從黨的利益考慮的），那是以自由人士的身份做的，不以編輯部的意志為轉移，但是對它也沒有任何影響。”<sup>④</sup>

但是據雪茄煙工人勒澤爾後來的供述，畢爾格爾斯在同盟中央委員會遷往科倫後，看來還是進入了“西德意志報”編輯部<sup>⑤</sup>。

① 參閱“西德意志報”，科倫，第2和第3號，1849年5月26和27日。

② 參閱“新時代”，第25年度（1906—1907），第2卷，第18頁。

③ 參閱“卡爾·馬克思，他的詳細年譜”，第86頁。

④ “斐迪南·拉薩爾遺信和遺著”，古斯塔夫·馬耶爾，第2卷，斯圖加特—柏林1923年版，第32頁。

⑤ 參閱布蘭登堡地方總檔案館，波茨坦，第30目，第94項，B字，第208號b。

貝克尔想通过“西德意志报”保证自己的领导作用的计划,说明他正如科伦法庭给普鲁士司法大臣的报告所指出的,“他不过想利用同盟作为达到自己的个人目的的手段”<sup>①</sup>。

如上面已经屡次提到的,魏德迈耶在1851年初担任同盟的第一个特使,作为同盟的组织者展开了积极的活动。此外,他还是除科伦以外同盟最好的最强大的区部法兰克福区部的主席,南德直至纽伦堡所有的支部都属法兰克福区部。因此,魏德迈耶的出差次数很多。尽管被驱逐出境,他的固定住址仍在法兰克福。魏德迈耶常到科伦来。雪茄烟工人勒泽尔后来在1854年2月12日在斯塔丁监狱受审时称:“被驱逐出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魏德迈耶,在1851年2月或3月间来过科伦几次。”<sup>②</sup>

魏德迈耶在科伦同中央委员们商谈的,除同盟的组织事宜外,首要的是创办新杂志的问题。他主要是同贝克尔和毕尔格尔斯在“西德意志报”报社内商讨这个问题。给杂志取了个简单的名字,叫“新杂志”。1851年4月5日,贝克尔把这项计划告诉了马克思,并请他写稿。1851年4月9日,马克思答应了同他合作<sup>③</sup>。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这项计划寄予很大的希望。1851年5月9日,恩格斯给马克思的信写道:“要知道我们很快就会再有一种我们所需要的机关刊物,我们在这个刊物上可以击退

① 布兰登堡地方总档案馆,波茨坦,第30目,第94项,R字,第208号。

② 布兰登堡地方总档案馆,波茨坦,第30目,第94项,R字,第208号b,柏林警察总局文件,关于因雪茄烟工人勒泽尔向政府供述而进行的揭发共产主义者团体的审讯,1848—1853年。

③ “卡尔·马克思,他的详细年谱”,第105页。

一切进攻,而又不致显出是从我們发出的。計划中的‘科伦月刊’比我們的‘評論’所具的优点,就在这里。我們將这一切推在老好人毕尔格尔斯的身上,而他这个忧郁性的人必定要受些委屈。”<sup>①</sup>

1851年5月中旬,詩人弗莱里格拉特来到伦敦。馬克思于1851年5月21日写信給恩格斯說:“他从德国带来了很好的消息。科伦諸人很活动。自九月以来,他們的密使即旅行各处。在柏林有两个很干练的代表……”<sup>②</sup>

杂志計划不久就要实现。1851年5月初,毕尔格尔斯由科伦中央委员会前往威斯特伐里亚,再由那儿經汉諾威去柏林。他要在汉諾威参加民主派的一次代表大会,貝克尔已弄到了参加大会的請帖。但是除此以外,此行还有这样的目的:視察同盟各个支部的情况,以及为所筹办的杂志征求訂戶和組稿。毕尔格尔斯这次出差于5月中旬在德勒斯登被捕<sup>③</sup>。继毕尔格尔斯和諾特容在薩克森被捕之后,貝克尔、丹尼尔斯、勒泽尔等人在科伦也被捕了。

① “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第1卷,參閱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228頁。

② 同上书,第234頁。

③ 參閱勒泽尔的供詞:布兰登堡地方总档案馆,波茨坦,第30目,第94項, B字,第208号b。

#### 四 德意志联邦和1851年的警察阴谋

在普鲁士正式加入重新恢复的德意志联邦的同时，共产主义者同盟的领导人于1851年5月被捕入狱。1851年5月8日，俾斯麦被任命为普鲁士驻联邦议会代表处参事。普鲁士政府于1851年5月10日给普鲁士驻联邦议会第一任代表馮·罗霍夫中将的训令中有这样的指示，首先要求德意志联邦议会“发现有破坏和颠覆分子时，就坚决加以镇压”。7月15日俾斯麦本人接任驻联邦议会代表时，这个“训令”仍然有效<sup>①</sup>。

普鲁士驻联邦议会代表处文件集的出版导言再一次特别指出：“如大家所知，联邦议会恢复后，它的活动的目的首先是肃清1848年革命运动的最后残余，至少在这个愿望上，奥地利政府同普鲁士政府、两国政府同它们的德意志盟邦是一致的。”这不仅是警察措施问题。这个政治纲领规定：

1. “废除各邦的同联邦根本法有抵触的宪法和法律”，即废除1848年德意志各邦实行的一切宪法和法律。

2. “限制反君主制的、社会主义的和共产主义的报刊。”

联邦议会一致同意这个纲领，并设立一个政治委员会准备付诸实行。普鲁士驻联邦议会代表俾斯麦在这个被人民称

<sup>①</sup> “1851—1859年联邦议会中的普鲁士”，普鲁士王国驻联邦议会代表处文件集，馮·波辛格尔博士编，第一编，莱比锡，1882年，第2页。

为“反动委员会”的委员会中起领导作用<sup>①</sup>。

瓦伦哈根·馮·恩色 1851年7月4日在他的日記中写道：“联邦議會！它只能重新走上这条什么目的也达不到的肮脏的老路：限制和破坏各邦的宪法，压制一切自由，干涉报刊和大学；警察、教会、监狱，一切都用来反对人民，用强权代替公理，肆意横行！它就这样令人厌恶地继续它旧日的可怜生活。他接着說：“相反地，这对它毫无帮助！”<sup>②</sup>他从而表示了这个信念：反动的德意志联邦議會毕竟镇压不了以工人运动为主导的民主运动。十天後，他在1851年7月14日的一篇日記中又談到了德意志联邦。他指出：“联邦正努力使联邦議會变成最卑鄙最下賤的警察机关。”<sup>③</sup>

还在重新加入德意志联邦以前，普魯士政府就努力謀求德意志各邦的警察当局的合作，迫害工人联合会和民主联合会。1851年在伦敦举行的工业展覽会使警察当局大起恐慌，他們唯恐許多工人和帮工会利用这个机会到伦敦旅行。伦敦是1848年革命的活动家的流亡中心；首先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儿工作。1851年1月6日，普魯士內政大臣就已經在一道命令中指使各省省长和各行政专員注意是否有工人前往伦敦，并进行适当的監視。1851年4月18日，普魯士內政大臣又就这件事給各行政专員下了一道命令，命令說：“根据多方面一致的消息，不容再怀疑：革命宣传将利用伦敦工业展覽会，

① “1851—1859年联邦議會中的普魯士”，普魯士王国駐联邦議會代表处文件集，导言，第29頁。

② 卡尔·奥古斯特·瓦伦哈根·馮·恩色：“日記”，第8卷，苏黎世1865年版，第239—240頁。

③ 同上书，第254頁。

不仅把它的叛国的机关，而且首先把手工业者和工人从欧洲各国尽量召集到伦敦来，以便物色适当的人选，充当用暴力实行他们的颠覆计划的工具，从而使他们能够在大陆各处同时按照一贯的计划实行反教会、反王室和反私有制的革命。”

据此，要求各行政专员“对所有从现在起领取前往伦敦护照的人或没有护照就公然前往伦敦的人实行登记，并在名单中标明哪些人在这次拟作的旅行中疑有应处罪的阴谋”。各行政专员每周要向内政大臣呈报一份这样的名单。这个命令还说，“此外，责成这些旅客回国必经的边境，警察局对这些人实行严格的检查，只有在护照经过签证和盖章后才允许他们继续旅行，每隔一周把这些人的名单及他们护照的签证准许他们前往的地点”呈报行政专员，“再从那儿转呈给我”。同时应同税关合作，对行李实行严密的检查。

内政大臣认为这些措施十分重要，所以他指示，“所作的报告要加上‘亲手’字样的标志，不要用普通的办事手续来呈递”。普鲁士财政大臣于1851年4月23日给科伦、闵斯特尔、斯塔丁诸省的税务厅长发出指示，要他们命令边境的税关官员同警察合作，检查从伦敦回国的人的行李。这个指示说：“如果警官实行不符合关税法规定的没收，也应当认为是适当的，所以应当让警官继续干下去。关于此事，我要求阁下尽可能注意保密。”<sup>①</sup>

<sup>①</sup> 德国中央档案馆第二馆，麦塞堡，第77目，第509项，第1号附件，关于对付德国革命鼓动的指令和安全措施，特别涉及1851年在伦敦举行的工业展览会，第1卷，1851年3月28日至8月31日。

由于害怕馬克思和恩格斯，害怕接受馬克思主义学說的工人，普魯士当局采取了违反他們自己的法律的专橫措施。自1851年4月以来，依照柏林警察总监馮·辛凱尔迪的提議，定期召开了德意志各邦警察官长的會議<sup>①</sup>。

辛凱尔迪負責貫徹一切反对工人和帮工的措施。所有关于要去伦敦或从伦敦回来的人的报告，普魯士內政部都轉給辛凱尔迪<sup>②</sup>。辛凱尔迪和政治警察的领导人施梯伯保持紧密的合作。施梯伯在1851年春天同辛凱尔迪一起組織派遣警探前往伦敦的工作。普魯士駐伦敦大使館秘书阿尔伯茨奉命监督偵探和特务。警监斯特劳赫在他到达伦敦后第二天，即1851年4月30日，給薩克森省长馮·維茨勒本写了个报告，关于普魯士警察在伦敦的活动組織部分，摘录如下：“上午十一点，我到普魯士大使館报到，受大臣委托負責这一工作的大使館秘书阿尔伯茨接見了我；他对閣下已交給我的訓令沒有作什么补充，于是我就到英国警长哈沙尔那儿报到。他負責訓練和領導外国警官……。

已到达的外国警官有：从布勒斯劳来的一个警监，从科伦

① 关于警察总监馮·辛凱尔迪在五十年代的作用，1848年革命的民主主义者阿道夫·斯特勒克羅斯写道：“在1851至1858年这些惨淡的年头，警察在柏林拥有几乎无限的权力，他們可以远远超越法律規定的权限……柏林警察总监馮·辛凱尔迪先生，在国家中占有特殊地位。尽管內閣大臣是他的直接上級，而馮·辛凱尔迪先生却常常从国王那里直接得到命令，他还可以不經过內閣大臣直接向国王作报告，从而获得了同他的职务本不相干的独立性。”（阿道夫·斯特勒克羅斯：“柏林五百年史”，第2卷，柏林1886年第4版，第1310頁。）

② 參閱德国中央档案馆第二館，表塞堡，第77目，第509項，第1号附件，第1卷。



来的一个警监和一个警士，从拿骚来的一个警监，从美因河畔法兰克福来的两个巡长，以及从巴黎来的八个警官。”这个报告也經普魯士內政部批轉柏林警察总监<sup>①</sup>。辛凱尔迪极力利用伦敦工业展覽会来不断扩大駐伦敦的警察机构，而特別重視使德意志其他邦在伦敦进行偵探活动的警官归他指揮。英国警察当局不反对外国警官在伦敦活动。敏頓行政專員于1851年5月4日向普魯士內政大臣报告：“如果不同邻近的德意志各邦政府一致行动，則所采取的措施将不能充分發揮預期的作用。”他还說，如果普魯士政府在伦敦的偵探发出的“必要的情报能及时到达这儿，在其中說明应特別等待哪些旅客，从而使无关的旅客尽可能少受所規定的目前还不习惯的措施的影响”，那就最理想不过了。首先要爭取不来梅参加反对工人的措施。普魯士內政部的一个局长馮·普特卡默在不来梅进行秘密談判，获得了成果。普魯士內政部不久就把不来梅警察厅1851年5月13日給普特卡默的信轉交辛凱尔迪，信中說：“由于市长斯密特先生的指示并鉴于閣下和市长先生不久以前举行的密談，請允許我們謹向您报告，我們拟派往伦敦的人，我处警监馮·洪特伦，于本月16日由这里动身，估計在本月18日到达伦敦，他将到汉撒同盟各城市的总領事詹姆斯·科庫洪处探听消息。我們恳請閣下尽快把上述不来梅警官的事通知貴方在伦敦的警官。此致敬礼。警察厅摩爾謹上。”內政部把这封信轉交辛凱尔迪作“适当的进一步处理”，辛凱尔迪于1851年5月27日批复：“已把此事通知

<sup>①</sup> 德国中央档案馆第二館，表塞堡，第77目，第509項，第1号附件，第1卷。

我处派往伦敦的警务顾问施梯伯博士,并指示他同不来梅警监馮·洪特伦联系。”<sup>①</sup>汉撒同盟各城市的大资产阶级无条件地情愿同普鲁士的受容克地主领导的警察合作,反对马克思和工人运动,并受普鲁士警察的指使去迫害工人和有民主思想的市民。普鲁士外交大臣于1851年5月24日把普鲁士内政大臣1851年4月18日关于检查来往旅客的命令通知汉诺威、奥尔登堡、绍姆堡-立贝和汉堡的政府,要求它们“考虑德意志各邦的与此有关的共同利益,在各邦也发布同样的命令”,这时汉堡和不来梅的参议院首先表示愿意满足普鲁士的愿望;遵照普鲁士的指令对来自伦敦的旅客实行检查<sup>②</sup>。

汉堡市常任法律顾问麦克于1851年8月29日再向普鲁士驻汉撒同盟各城市的代办兼使馆参赞馮·卡姆普茨保证:“汉堡的警察当局将毫不疏忽地实行最严密的检查,使任何一个危害治安的人都得不到入境的许可。自从普鲁士王国政府于今年5月26日就这件事提出第一次建议以后就已经为此目的作了布置:“对一切有嫌疑的来自伦敦的旅客的身份证实行最严格的检查,并把所产生的怀疑通知这些招人怨恨的人前往的国家的有关当局。”不来梅参议院在1851年8月13日也作出了类似的保证。

由于1851年5月间整个德国的警察恐怖活动变本加厉,逮捕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获得成功,普鲁士政府从一开始就极力在这件事上大作文章,以便在德国发起一个完全消灭共

<sup>①</sup> 德国中央档案馆第二馆,第77目,第509项,第1号附件,第1卷。

<sup>②</sup> 同上。

产主义者同盟和根除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說的运动。

1851年5月20日，辛凱尔迪在一个“专门报告”中向普魯士內政大臣报告了在萊比錫逮捕諾特容的情形。他指明了他的联系，結尾說：“这件事可能关系重大。”普魯士政府也获得了关于科伦其他逮捕事件的特別报告（这些报告統統轉給了辛凱尔迪）之后，內閣于1851年6月3日在一次特別會議上討論了逮捕的問題。普魯士司法大臣西蒙斯于1851年6月4日就此事給科伦检察长下了一道命令。在提到以科伦为中心的同盟“不仅致力于改变現存的政体，而且致力于推翻目前的社会制度”时，这道命令說：“面临这种阴謀的巨大危險，政府期待它的一切机关在一致合作中發揮最大的力量和提高警惕，以便发觉和确定罪案，并給犯罪分子以法律制裁。”司法大臣下令“采用所拥有的一切手段”，“迅速地大力地”进行“搜查、沒收和暂时扣押”<sup>①</sup>。

然而，对被捕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員的活动和联系的偵查并不仅限于德国；所策划的审判案的矛头还同时指向在伦敦的馬克思。辛凱尔迪把在諾特容和华尔格尔斯那里搜获的“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和中央委员会两次告同盟书等文件的副本寄給在伦敦組織間諜特务活动的警务顧問施梯伯，要他注意盟員的通訊，注意“密謀的档案”<sup>②</sup>。

1851年5月20日，科伦法院預审推事和地方法院陪審員

① 德国中央档案馆第二館，表塞堡，第77目，第505項，第16号，关于1851年在科伦发现的共产主义和革命的阴謀活动的文件，第1卷，1851年5月24日至1852年12月27日。

②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468頁。

普費費爾向普魯士外交部提出請求：“請由王國駐倫敦大使館作進一步調查，並盡量收集能說明案件的材料。”1851年5月24日，普魯士外交部就通知內政部這個消息：“我王國駐倫敦大使已奉命把他通過英國警察當局或通過現在倫敦的普魯士警官的介紹……所能獲得的關於在科倫新成立的亂黨中央委員會的情報通知預審推事。”<sup>①</sup>

從有關材料可以看出：政府平時是以拖拖拉拉的官僚作風辦事的，但這次行動卻極為迅速。迫害共產主義者同盟被認為是政府的迫切任務，不僅由警察當局和司法當局，而且由內政部和外交部優先處理。

關於這件事的一切報告最後都送到辛凱爾迪那里。馬克思說：“在科倫被告們的審前羈押期間，柏林的警察總監辛凱爾迪充當了總指揮”<sup>②</sup>。

1851年6月16日，辛凱爾迪在一份備忘錄中向內政大臣說明，審訊權必須集中在一個人的手里，否則不會有什麼效果：“坦率地說，雖然我不大信任萊茵省的陪審員，但是我深信只有在科倫進行審訊才是適當的，況且這個案子本來是屬於那里的，我謹此懇請（我曾經在私人的報告中不揣冒昧地請求過）大人與同司法大臣和外交大臣兩位大人初步商談後並在他們的贊助下惠予關照此事：把一切有關當局和各邦的全部審訊工作下放到科倫，並請它們把全部監犯送到那兒去。我並不無視在這件事情上可能出現的困難：在被告當中普魯士臣民占極少數，他們也不是在普魯士邦中被捕的，而

① 德國中央檔案館第二館，麥塞堡，第77目，第505項，第16號，第1卷。

②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518頁。

且外国人可以依法請求把他們移交本國法院或逮捕他們的法院審理。然而他們都密謀反對普魯士，至少是間接地反對，對這件事的處理是屬於普魯士當局本身的職權範圍內的。這也許要提出法律的根據。如果這是不容許的，而又沒有別的办法，那我可以担保：整個審訊不能也不會有特殊的效果。”<sup>①</sup>

對畢爾格爾斯和諾特容的審訊不許放在薩克森當局的手里。辛凱爾迪要給自己邀功，他在警務顧問施梯伯的協助下，不僅要判被告有罪，而同時要給工人運動以毀滅性的打擊。辛凱爾迪的計劃規定，對被告的審訊要同迫害工人聯合會的運動結合起來。因為只有通過適當的運動把被捕的人說成是在工人聯合會協助下搞大陰謀的領導人，對被告的訴訟才能合法地導致所期望的判決。辛凱爾迪物色到了科倫警察廳長舒爾茨（Schulz，在文件中也常常寫作Schultz）作為他的計劃的執行者。馬克思稱舒爾茨為“政府當局的主要審判台柱”<sup>②</sup>。

1851年7月9日，辛凱爾迪向內政大臣建議授予舒爾茨特殊權力，使舒爾茨隨時可以進行偵查。辛凱爾迪還說：

“不用說，舒爾茨在執行這個任務的時候，會以必要的慎重、謹慎小心進行工作，並尽可能避免引人注意，我們責成他這樣做，在這方面科倫法院用不着擔心。”

辛凱爾迪接着告訴大臣，舒爾茨還奉命進一步對付工人聯合會。關於這個問題，呈文說：舒爾茨將在國外的警官（指

① 德國中央檔案館第二館，表塞堡，第77日，第505項，第16號，第1卷。

②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462頁。

被指定为舒尔茨的助手的汉诺威警察厅长维尔穆特和汉堡刑事警官霍曼博士)的协助下,“并利用由他们负责提供的情报,设法进一步对付现在比过去更频繁地进行秘密活动的工人联合会,这些工人联合会都有相当纯粹的共产主义基础,而且通过这种方式同恶名昭彰的伦敦工人联合会保持联系,似乎同科伦共产主义者同盟也保持联系”。首先考虑到的是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进行侦查,约瑟夫·魏德迈耶在那里从事工人运动仍然很有成效;此外便是在卡塞尔进行侦查。普鲁士司法大臣马上把内政大臣请求的特殊权力授予舒尔茨,于1851年7月14日指示科伦的检察长对舒尔茨“表示公务上的服从,因为这件事的重要性以及他的使命的目的需要这样做”<sup>①</sup>。

因此,侦查不照通常的程序来进行,即不由预审推事确定真正的构成犯罪事实。法院进行侦查,对于内閣没有帮助,因为必须虚构一个阴谋,以便消灭工人运动。为此目的,威廉·施梯伯博士于1850年11月被任命为政治警察的领导人,施梯伯便于1851—1852年在伦敦组织间谍特务活动。内政大臣曼托伊费尔男爵的“回忆录”载有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于1850年11月11日给曼托伊费尔的一封信,国王在这封信中希望任命施梯伯,以便组织对工人运动的挑衅:“……揭露解放阴谋的组织,使普鲁士公众看到一出正当地渴望已久的戏,即一个阴谋被破获并且(首先)受到惩办,施梯伯难道不是担任这个工作的一个宝贵人材吗?因此,您赶紧任命

<sup>①</sup> 德国中央档案馆第二馆,麦塞堡,第77目,第505项,第16号,第1卷。

施梯伯，让他进行他的試驗吧。”<sup>①</sup>

普魯士政府依照辛凱尔廸的提議把科伦被告的“偵查工作”交給舒尔茨和維尔穆特，也是从这个观点出发的。

“偵查”的任务是发现“阴谋”，与这次“偵查”有关的是柏林警察总监馮·辛凱尔廸力图使德国所有的警察机关在迫害工人运动时进行合作。辛凱尔廸同汉諾威的維尔穆特博士、薩克森的参事厄伯哈尔特和維也納市民保卫团大尉馮·魏斯一起建立了“維持社会安宁和秩序的保安官員联合会”。辛凱尔廸爭取得由各主要警察总监定期給柏林送报告。从1851年秋天起，辛凱尔廸定期給各个警察机关分发“国内周报”（供普魯士国内用的周报）以及“国外周报”（供德意志其他邦用的周报）。这些周报載有一切有关搜查和追查工人联合会和民主联合会及其会员、有关逮捕工人及有民主思想的小资产者的消息，并报道德国流亡者的活动。出版这些“周报”是为了便于迫害一切进步民主运动及其拥护者<sup>②</sup>。普魯士警察当局力图领导反对工人运动的斗争，力图在1851年5月逮捕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之后在全德国建立警察恐怖制度，在这方面，恢复了的德意志联邦議会是普魯士警察当局的最好的支柱。瓦伦哈根·馮·恩色于1851年6月13日在他的日記中写道：“在全德国进行搜查、逮捕提到日程

① 奥托·曼托伊费尔男爵：“回忆录”，亨利希·馮·波辛格尔編，柏林1901年版，第1卷，第328頁；还可參閱梅林写的馬克思“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柏林1914年第四版导言，第165頁。

② 參閱阿尔弗雷德·鄂皮茲：“关于1850—1852年德国工人运动发展的文件研究”；“中德意志档案研究”，內政部国家档案管理局出版，柏林1953年，第384頁。

上面来了；一定要查到真正的暴乱、阴谋文件，可是一无所获。”<sup>①</sup> 搜查、逮捕在德国各地已成为司空见惯的事。所以瓦伦哈根·馮·恩色于1851年6月20日記道：“到处都有搜查和逮捕事件，不可胜数！辛凯尔迪甚至在德意志其他国家进行搜查、逮捕，但效果很差，他使自己成为笑柄。”<sup>②</sup> 1851年7月21日，瓦伦哈根·馮·恩色又有所感而在他的日記中記下：“又在德国各地搜查、逮捕！甚至当住在毕尔克的弗莱里格拉特外出的时候到他家里搜查。警察想找他的新詩，可是找不到！他的詩早已通过各个书店自由地散播到全世界去了！”<sup>③</sup>

唆使英国政府把一切政治流亡者驅逐出境，这也是普魯士政府十分关心的事。早在1851年3月4日，普魯士內政大臣就向首相兼外交大臣馮·曼托伊費尔男爵提出这个问题：“是否可在大国之間商定反对著名的革命首腦即欧洲国家制度和公民社会的公敌的决定性措施，是否可以把他們驅逐到殖民地去以免为患。”1851年9月12日，內政大臣再次提到“情况紧急”，他甚至考虑要求英国政府“不分皂白把流亡者一概驅逐出境”。馮·曼托伊費尔男爵为各大国采取一致行动反对流亡者而认真地作了努力。1851年10月5日，他告訴普魯士內政大臣說：“如果各个有关政府在这方面尽可能合作，則可保成功。因此，我已經首先向維也納方面提出建議，要他們同我們一起請求联邦議會授权两国朝廷，以整个联邦

① 瓦伦哈根·馮·恩色：“日記”，第8卷，第212頁。

② 同上书，第221頁。

③ 同上书，第246頁。



名义采取适当的步骤,以便今后得以代表本国和联邦在伦敦活动。下一步我要等到维也纳方面答复之后再作决定。我还打算向圣彼得堡发出相应的邀请,如果得到奥地利和俄国同意,再邀请意大利各邦的朝廷。”<sup>①</sup>

普鲁士政府就这样执行这个计划,为了镇压工人运动,甚至想复活1815年的“神圣同盟”。

1851年11月9日,瓦伦哈根·馮·恩色在他的日记中对1851年德国人民所遭遇的事件作了总结:“反动派变本加厉,警察当局和联邦议会一味蛮干,不让自由有丝毫残留。一切活动,一切休息都要受到监视:他们这样疯狂,难道他们可以指望获得成功,获得什么结果吗?他们现在镇压一切社团,特别是各社团进行联合的企图受到严厉的惩办,不准举行群众集会,至少不准举行露天的群众集会。这些笨蛋啊!”瓦伦哈根·馮·恩色不由得用这句话来结束他的论述:1848年一切也都被禁止,然而革命还是爆发了<sup>②</sup>。

---

① 德国中央档案馆第二馆,表塞堡,第77日,第509项,第43号,第1卷。

② 瓦伦哈根·馮·恩色:“日记”,第8卷,第416—417页。

## 五 1851年5月逮捕后的 德国工人运动

政府和警察当局力图在社会上制造畏惧共产主义者的气氛。这也是把在被捕者那里搜获的文件交给报纸发表的动机。这些文件主要是指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的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以及由毕尔格尔斯起草的1850年12月1日科伦中央委员会通告。“科伦日报”首先刊登毕尔格尔斯起草的通告，他在德勒斯登被捕时有几份通告落到警察手里。恩格斯于1851年6月27日给马克思的信写道：“毕尔格尔斯教训式的庄严通告连同有名的半暧昧的议论，真够他们头痛，而他们也恰恰只将那些不中用的地方大量刊布出来。”关于发表的结果，恩格斯接着写道：“政府企图利用德勒斯登的大发现作为威吓，是完全失败了，这是资产阶级情绪的一个好指标。……没有一种报纸愿意受诱惑，政府在体育联合会、自由团体和民主主义裁缝老板中，对以后的阴谋从事侦查，此等绝望的实验，在一方面证明它对市民的冷淡是何等愤慨，并尽力刺激他们的好奇心，在另一方面证明要由规程和通告的线索达到更多的发现，是怎样地不中用。”<sup>①</sup>

1851年7月13日，马克思请恩格斯注意“科伦日报”在‘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标题下刊载了第二个文件。这是我俩起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第1卷，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244—245页。

草的告同盟书——实质上不过是对民主派<sup>①</sup>的一种作战计划。一方面，公布这文件是好的，它同毕尔格尔斯的在形式上多少有些荒唐、在内容上更难令人满意的文件正相反。而另一方面，有些地方又使现已被捕的人处境更为困难。”<sup>②</sup>

政府和它的报纸公布这个文件却大大地帮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忙。恩格斯在1851年7月17日给马克思的信写道：“然而，这文件公布出来，并转载于一切报章，在其他各个方面，都有绝大的好处。新进共产主义者的个别的隐蔽的团体，根本不为人所知，然而根据经验，这些团体必定散布德国各地，它们将由此获得一种良好的支持，就是从‘奥格斯堡总汇报’的文章也看得出，这个文件对该报的影响与最初的发现完全不同。”<sup>③</sup> 1851年7月20日前后，恩格斯再次提到公布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告同盟书所发生的影响：“在另一方面，像我所预见的，到处有共产主义的小团体在‘宣言’的基础上组织起来，使我多么高兴啊。这正是我们在向来的参谋本部软弱的情况下所欠缺的。只要有条件，自然会找到兵士的，参谋本部将不是由斯特劳宾分子组成，而能有比受过某种教育的二十五人更多的人供选择，这种前景是令人十分愉快的。”<sup>④</sup>

因此，当局以这个所谓起诉材料达到了它想不到的结果。它未能在社会上、在广大的人民群众中造成反对被告、反对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情绪，从而使自己便于进行审判。“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即警察搜

① 民主派一词马克思在这里是指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立场。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参阅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247页。

③ 参阅同上书，第252页。

④ 参阅同上书，第256页。

获的全部文件，倒成为控訴资产阶级社会及其国家的材料。用这个手段未能瓦解工人运动，相反地，只能巩固工人运动。普魯士当局对馬克思、恩格斯和共产主义者同盟展开的进攻意味着什么呢？恩格斯1851年5月9日給馬克思的信写道：“他們不能將‘新萊茵報’、‘宣言’和其他一切东西从历史上一笔勾銷，他們的一切咆哮沒有用处。”<sup>①</sup>

無論提出“起訴材料”也好，残酷地对待被告也好，当局都不能陷害工人运动，不能在人民当中制造适合政府意图的情緒。美因茲同盟支部领导人弗里德里希·勒斯納在他的回忆录中說，他在美因茲監獄里所受的待遇在社会上引起了震动，致使黑森一个議員出来干涉。勒斯納于1851年6月26日被解往科伦。他带着手铐，还要走路，大概有二三十个犯人一同去。晚上，他必須在单人監房过夜，因为他被认为是特別危險的人。勒斯納在途中11天；他认为在这11天中所受的虐待是整个監禁期間最坏的。但是当局用这样的手段仍不能使居民相信共产主义者是危險分子<sup>②</sup>。

在中央委员会委員們被捕后，同盟的工作仍然能够繼續进行，这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由于在法兰克福的約瑟夫·魏德迈耶的功劳。他得到逮捕的消息后就馬上化名赶到科伦。不用說，办杂志的計劃这时不能实现了，而且魏德迈耶本人的处境也十分危險。

魏德迈耶1851年6月10日給馬克思的信写道：“我的科伦計劃現在自然是落空了，無論如何，我在这里只可以作逗留几

① “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第1卷，參閱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229頁。

② 弗里德里希·勒斯納：“在社会民主运动中的六十年”，第25—26頁。

个星期的打算，因为我不知道靠什么維持生活。在目前的情况下，我在德国不可能謀‘生’，我的眼光要轉向外国。”<sup>①</sup>他把他的家眷帶到乡下，自己在薩克森豪森的一家幽靜的旅店租了个房間，以便从那儿繼續領導法蘭克福同盟区部。他还希望在他的藏匿处实现他的老計劃，給工人編写一本通俗的政治經济学<sup>②</sup>。早在1850年12月28日，他就曾經写信告訴馬克思这个計劃：1)他要在导言里論述經济問題和政治問題的关系，2)要研究分工問題，3)要研究货币的产生問題，4)要写述租稅問題，5)保护关稅和自由貿易問題，最后，6)工人的要求問題<sup>③</sup>。被捕的危險更大了。他在1851年7月5日写信給馬克思說，他要馬上撤退才好，虽然警察还没有发现他的住处，但是搜查沒个完，而且“鬼才受得了长期的游蕩和藏匿的生活”<sup>④</sup>。1851年7月27日魏德迈耶写給馬克思的报告他未来的計劃的下一封信已經是从苏黎世发出的了。

尽管受到迫害，同盟在西德和南德仍然十分活跃。1851年7月5日，在流亡前不久，魏德迈耶写信給馬克思說：“法蘭克福区部有了保障”。8月30日他从瑞士把他最近一次訪問南德各同盟支部的情形报告馬克思，在“法蘭克福大家都很团结”，維尔騰堡各支部因“开除了共和派資產階級分子”而获得了巩固<sup>⑤</sup>。

① “沒有发表过的书信”，莫斯科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

② “新时代”，第25年度（1906—1907年），第2卷，第56頁。

③ 參閱“沒有发表过的书信”，莫斯科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

④ “新时代”，第25年度（1906—1907年），第2卷，第56頁。

⑤ “沒有发表过的书信”，莫斯科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

## 1. 法兰克福工人联合会和拿骚的运动

在魏德迈耶留在法兰克福的最后几天，工人们得以在市园林里举行了约有二万五千人参加的民主派的民众联欢会①。

当局所以特别注意法兰克福工人联合会，是因为它估计黑森和南德强大的民主运动的中心在这里。法兰克福当局在联邦当局和普鲁士警察当局同意下把主要注意力放在这上面：把不是在法兰克福出生的会员驱逐出境，借以瓦解法兰克福工人联合会。从1851到1852年，柏林警察总局的周报几乎每个月都载有因参加工人联合会而被逐出法兰克福的工人和帮工的名单。1852年1月20日，柏林警察总监辛凯尔迪把所有被逐出法兰克福的工人的名单通知德意志各邦的警察当局，并要求予以特别监视，“因为他们统统加入了那儿的高度民主的或多或少地以宣传共产主义思想为目的的联合会，他们一定会在他们的家乡努力扩大联合会”②。柏林警察总监在1852年2月22日的周报中不得不自己承认驱逐出境的办法收效甚微：“大多数被驱逐出境的人在奥芬巴哈、勒德尔海姆和博肯海姆居留下来，他们在那里发展联合会如故。”③柏林警察总监要求“看作机密”文件的1852年3月9日报告说：“据可靠的消息，民主派的活动依然如故，他们力图弥补由于放逐而

① 参阅怀特·法伦廷：“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和1848—1849年革命”，斯图加特1908年版，第483页。

② 布兰登堡地方总档案馆，波茨坦，第30目，第94项，W字，第188号，柏林警察总局文件，关于柏林国外周报，第2卷，1852年。

③ 布兰登堡地方总档案馆，波茨坦，第30目，第94项，W字，第225号。

造成的空缺。联合会在‘体育协会’、‘歌唱家协会’、‘乐团’、‘約翰尼斯歌詠团’、‘合唱团’等不引人注意的名目下繼續存在，它們和以前一样是培植民主和共产主义的学校。”<sup>①</sup>

在法兰克福的周围，在拿騷全境，都可以明显地看出同盟盟員对工人联合会及其他民主联合会的影响，“1850年6月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談到这个影响：

“中央委员会希望所有支部和盟員都了解到，同盟这样影响工人組織、体操团体、农民組織、雇农組織以及其他組織，是有重大意义的，因此各地都应当尽力做到这一点。中央委员会建議各总区部和跟它們保持直接联系的支部在最近的来函中报告这一方面的活动情况。”<sup>②</sup>

在拿騷有供同盟盟員进行这种活动的肥沃土壤。1851年9月3日柏林警察总局周报报道：“民主党在拿騷公国比在任何其他邦获得更大的发展，具有更好的組織。它不仅仅以城市（除維斯巴登外，本来只有一些不大的城市）为限，而且扩展到全国乡村，到处紧密地組織在一起。例如，如大家知道的，狄伦堡、馬連貝尔格、迪茨、奧拉年施泰因、圣·哥阿尔斯豪森、里姆堡、布劳巴哈、兰施泰因等村鎮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以体育、歌唱、射击等社团为名而散布到全国去的社团，在一家嚣张的坏报纸支持下互相保持紧密的联系……一句話，可以說全国都是民主的了。”<sup>③</sup>此外，如警察当局指出的，“維斯巴登和美因茨党的领导人同科伦积极通訊”，被认为是拿騷运动有

① 布兰登堡地方总档案馆，波茨坦，第30目，第94項，W字，第225号。

②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64頁。

③ 布兰登堡地方总档案馆，波茨坦，第30目，第94項，W字，第118号，柏林警察总局文件，关于柏林国外周报，第1卷，1851年。

共产主义倾向的确凿的证据<sup>①</sup>。

法兰克福及其附近的情形就是如此，德意志联邦议会1851年春天起在那儿复会。俾斯麦自1851年5月11日以来即逗留在法兰克福。1851年7月15日俾斯麦被任命为普鲁士驻联邦议会代表，并同时兼任普鲁士驻拿骚政府和驻法兰克福市代表<sup>②</sup>。俾斯麦认为自己的首要任务是注意在法兰克福及其附近、在拿骚等地采取极严厉的手段对付工人联合会和民主联合会。他就任代表第二个月就已有机会显示他作为普鲁士代表的“权力”。拿骚的两个村镇迪茨和里姆堡曾邀请客人在1851年9月14至16日到奥拉年施泰因参加教堂落成周年纪念会。普鲁士警察当局获悉：法兰克福工人联合会主席、鞋匠帮工施尔巴哈（施尔巴哈一说是鞋匠帮工，另一说是裁缝帮工），据柏林警察总局周报说，“被查明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他将参加教堂落成周年纪念会，他们使教堂落成周年纪念会变成一个盛大的民众集会，“这个集会要在那里把拿骚的和普鲁士莱茵省的一切著名的民主人士联合起来”。警察厅长舒尔茨<sup>③</sup>1851年8月28日从卡塞尔给普鲁士首相兼外交大臣冯·

① 参阅布兰登堡地方总档案馆，波茨坦，第30目，第94项，W字，第225号。

② 参阅奥托·冯·俾斯麦侯爵：“回忆录”，斯图加特和柏林1921年版，第89—91页。

③ 虽然这个警察厅长叫做舒尔茨(Schulz)，但必须认为他和辛凯尔迪在部里为之求得特殊权力的人是同一个人。辛凯尔迪的报告固然说是舒尔茨(Schultz)，但是在马克思的“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中也说是舒尔茨(Schulz)。据辛凯尔迪的报告，警察厅长舒尔茨或舒尔茨要在卡塞尔追查工人联合会。据辛凯尔迪1851年8月8日的信说，舒尔茨要在8月中旬离开科伦，到北德、中德和南德追查工人联合会。因此1851年8月28日从卡塞尔发出的报告应认为是关于追查情况的报告。



曼托伊費尔男爵的“关于拿騷情况”的报告,更指出这“事实足以证明这个集会纯粹政治性的”。这个报告接着说:“依鄙见,不能允许举行奥拉年施泰因民众集会。整个中南德是那么民主和秘密,如果还让它有机会普遍联合起来,并达成到最近的将来还有效的协议,那是十分麻痹大意和危险的;当政府看来不能阻止群众集会时,通过这样的盛大的群众集会进行宣传最能提高党的士气,这就更不用说了。”这个警察厅长紧接着提到了民主运动、特别是共产主义者同盟在莱茵省的大发展。他提出镇压运动的建议是根据俾斯麦所发表的意见:“孤立和缓和的手段已经不够了。在法兰克福、美因兹、沃尔姆斯等地,人们可以找到真的宝贝,但要由谨慎可靠的官员火速进行搜索,尤其要使法兰克福迅雷不及掩耳,事先秘密派一个陌生的警察人员到那里之后,立刻宣布戒严。普鲁士代表冯·罗霍夫中将和冯·俾斯麦-申豪森先生以及所有其他主管人员,例如黑森-达尔姆施塔特大公国首相冯·达尔维希克男爵先生都有这样的意见。”<sup>①</sup>

从普鲁士外交部的通报中也可看出俾斯麦在迫害民主运动和共产主义者同盟中起着领导的和十分积极的作用。1851年9月2日,普鲁士外交部通知普鲁士内政大臣冯·威斯特伐里亚说:“我<sup>②</sup>已请王国驻联邦议会代表以我国驻拿騷公国宫廷的外交代表的资格,适当地劝说维斯巴登政府阻止定本月14至16日在奥拉年施泰因举行的所谓教堂落成周年纪念会。”

① 德国中央档案馆第二馆,麦塞堡,第77日,第509项,第26号,关于拿騷公国有政治嫌疑的活动和人民骚动,1832—1853年。

② 曼托伊費尔。

但是普魯士外交部的这个通知中值得特別注意的話是：警察厅长舒尔茨自卡塞尔作的报告中提出的迫害工人运动的“同样的建議”“也是由法兰克福<sup>①</sup>作出的”，“大概”已“成为同陛下內閣磋商的問題”<sup>②</sup>。因此，普魯士依俾斯麦的建議力求在德意志联邦采取同奥地利一致的行动，反对工人运动。

俾斯麦达到了禁止在奥拉年施泰因举行紀念会的目的。如他自己在1851年9月14日向普魯士首相兼外交大臣馮·曼托伊费尔男爵报告的，他已使拿騷駐联邦議会代表馮·頓格伦男爵給拿騷公爵造成“紀念会危險的想法”，公爵于是在1851年9月10日宣布禁止。俾斯麦已在1851年9月7日就这件事給拿騷內閣一个照会，拿騷內閣不得不贊同公爵宣布的禁令。

普魯士內政部也不是閒着无事的。在科布伦次的莱茵省长馮·克萊斯特-勒措夫<sup>③</sup>于1851年9月10日奉命派一名警探到奥拉年施泰因去，如果教堂落成周年紀念会“仍擅自举行，火速报告”<sup>④</sup>。

的确，在禁止拿騷民間节庆上，俾斯麦、馮·克萊斯特-勒措夫之流不大愉快，因为工人并不因此而气馁。1852年6月

① 即由俾斯麦。

② 德国中央档案馆第二館，麦塞堡，第77目，第509項，第26号。

③ 原任波美拉尼亚县长的馮·克萊斯特-勒措夫不久以前被任命为省长，因为他特別頑強地迫害工人联合会和民主联合会。瓦伦哈根·馮·恩色在1851年7月10日的日記中記述了对这次任命的反应：“在莱茵省，人們对波美拉尼亚县长馮·克萊斯特-勒措夫被任命为省长一事感到十分震惊和憤慨，人們已准备对他进行斗争。人們管他叫做总督。事实上再也找不到更好的方法激起已走投无路的莱茵人的革命情緒了。”瓦伦哈根·馮·恩色：“日記”，第8卷，第248頁。

④ 德国中央档案馆第二館，麦塞堡，第77目，第509項，第26号。

27日，工人联合会和民主联合会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园林里举行了一个盛大的联欢会，四邻如奥芬巴哈、哈瑙和美因茨的体育协会和民主联合会都来参加<sup>①</sup>。

俾斯麦以他的普鲁士驻联邦议会代表的地位以各种方式支持普鲁士警察迫害工人运动。他认为自己在这方面的任务主要是在德意志联邦的各邦贯彻反对工人运动的措施。

1851年，俾斯麦在担任驻联邦代表的头几个月中就已经提出了相应的建议。在联邦议会1853年4月14日会议上，俾斯麦提出了关于反对工人联合会的措施的议案；会后，关于这个问题他在1853年5月5日的报告中这样说：“如随1851年11月19日指令发出的备忘录详细说明的，王国政府本来的目的是在加入联邦的各邦消灭有革命和共产主义倾向的工人联合会。”俾斯麦同时说，不应禁止“有一定名称的社团”，而应颁布“关于结社的一般条例”，“保证当局有可能获悉社团的各种活动，但对社团的一切秘密活动以及对一切不登记而擅自成立的社团，不管其宗旨有益或有罪，一律予以严厉的法律制裁”<sup>②</sup>。1854年7月，俾斯麦以普鲁士驻联邦议会代表资格终于使在全德禁止工人联合会和民主联合会的决议得以通过。

## 2. “工人兄弟会”

工人和帮工的一切联合、工会的一切活动、特别是加入

---

① 布兰登堡地方档案馆，波茨坦，参照1852年11月10日柏林周报，载：第30目，第94项，W字，第188号，关于柏林国外周报，第3卷，1852—1853年。

② “1851—1859年联邦议会中的普鲁士”，第一编，文件第230—232页。

1848年9月成立的“工人兄弟会”的职工和流动工共济会，自1850年以来被怀疑是当局常说的“培植共产主义的学校”，这就是说促进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学说的传播。

1850年春天，普鲁士和萨克森当局通过密探获悉，“工人兄弟会”的工人在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的影响下越来越相信革命斗争的必要性。大约在1850年2月21日，许多工人代表在莱比锡召开了秘密的代表大会。关于这次秘密的代表大会的讨论情况，密探给普鲁士内政部的报告是这样说的：“关于德国工人参预民主政治，这已肯定无疑，因为人们必须先摆脱政治障碍，才能考虑到解决社会问题……”密探的报告还要内政部注意：“根据名单，参加兄弟会的德国工人人数已超过八十万。”这次秘密的代表大会选出了新的中央委员会，由五人组成，其中有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于1848年曾参加过柏林工人运动的俾斯基、不来梅雪茄烟工人科尔维（由于雪茄烟工人勒泽尔等人的活动，共产主义者同盟在雪茄烟工人协会中的影响特别大）、编“兄弟会”杂志的莱比锡印刷工人甘格洛夫、爱北斐特的施维宁格尔和维尔茨堡的莱斯。这个秘密的中央委员会没有固定的地址，有时在不来梅，有时在汉堡开会<sup>①</sup>。关于莱比锡秘密代表大会的报告，使得普鲁士和萨克森内政部一致认为要进一步调查莱比锡事件和迫害“工人兄弟会”。萨克森当局在莱比锡、弗赖堡和符尔岑进行了搜查。1850年5月13日萨克森内政部（参事厄伯哈尔特）在文件上的批示这样说明搜查的理由：“到处存在着的工人联合会日益明

<sup>①</sup> 参阅德国中央档案馆第二部，麦塞堡，第77目，第550项，第10号，关于流动帮工的革命联合会，第5卷，1844—1850年。

显地力图通过内部联系去控制和影响公众事务，政府必须更加注意，因为联合会事务的领导人是属于最危险的革命阶级的。”<sup>①</sup> 薩克森內政部于1850年6月間把搜获的材料报告柏林、慕尼黑、斯图加特等地。

在薩克森、普魯士和其他地方有关当局偵查“工人兄弟会”的活动的同时，1850年6月，馬克思和恩格斯把“1850年6月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寄給德国各同盟支部，告同盟书指出：“‘工人兄弟会’的一些最有影响的会员也是同盟盟员。”<sup>②</sup> 薩克森警察在萊比錫邮局截获了一份告同盟书。德勒斯登內政部在一份消息通报中把告同盟书的内容通知德意志其他有关当局，此外还在1850年7月21日通知了柏林警察总监辛凯尔迪<sup>③</sup>。

1850年夏天，薩克森內政部拟了一份包括41个社团的“黑名单”，要薩克森警察予以特別監視。其中包括六个工人联合会<sup>④</sup>。巴伐利亞內政部曾利用薩克森提供的情报进一步偵查“工人兄弟会”在巴伐利亞的发展情况。

巴伐利亞內政部1851年6月30日的备忘录說：“职业顛复分子一直认为自己的首要任务是：利用一无所有的阶级工人阶级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并把德国的所謂‘工人兄弟

① 德勒斯登薩克森地方总档案馆，薩克森內政部档案卷宗第17号甲，第3頁以下，轉引自：阿尔弗雷德·鄂皮茲：“关于1850—1852年德国革命运动发展的文件研究”；“中德意志档案研究”。內政部国家档案管理局出版，柏林1953年，第386頁。

②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64頁。

③ 参閱阿尔弗雷德·鄂皮茲：“关于1850—1852年德国革命运动发展的文件研究”，第387—388頁。

④ 参閱同上书，第385頁。

会'的领导权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而从表面上看来起初只抱着这样的目的,即教育这个阶级,消除他们的贫困状态,以此作为未入会的人的诱饵,作为诽谤力求进步的政府的手段。”巴伐利亚内政大臣在备忘录中还开列了慕尼黑、维尔茨堡、累根斯堡、纽伦堡和奥格斯堡等31个巴伐利亚城市中的工人联合会名单。其中包括许多流动工共济会,慕尼黑有一个流动工共济会拥有几乎两千个会员。巴伐利亚外交大臣冯·德尔·普佛滕把这个备忘录的副本寄给维也纳、柏林、德勒斯登、汉诺威和斯图加特的政府<sup>①</sup>。纽伦堡“工人兄弟会”事实上充满着革命情绪。纽伦堡“工人兄弟会”于1850年秘密散发的石印的呼吁书宣告:鉴于在资本压迫下工人“长期以来受到何等的苦难,只要在他們中間大声一呼,就是说一切劳动者联合起来,他們把原料制造成一切使生活舒适美满的东西,可是这一切产品他們享受得最少,甚至经过了最辛勤的劳动,往往連半飢半飽的生活都不能維持。对付资本及其伪善的占有者的唯一手段就是联合起来,德国全体工人联合起来。”<sup>②</sup>

共产主义者同盟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区部,好像是通过魏德迈耶建立的属于法兰克福区部的纽伦堡支部,同“工人兄弟会”有密切的联系。据勒泽尔說,美因兹同盟支部主席勒斯納得到区部主席魏德迈耶同意,于1851年春赴纽伦堡参加秘密的工人兄弟会代表大会<sup>③</sup>。

① 参阅卡尔·吕定格尔:“1848—1850年巴伐利亚工人运动”,博士论文,慕尼黑1934年版,第8—11页。

② 同上书,第25页。

③ 参阅布兰登堡地方总档案馆,波茨坦,第30目,第94项, R字,第208号乙。

共产主义者同盟在莱茵省、莱茵黑森和拿 骚得到最大的发展,并积极地展开活动,“工人兄弟会”在这些地方也是最先进的和組織得最好的。这无疑是由于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工人联合会中起作用的原故<sup>①</sup>。

1851年春天在柏林被捕的不仅有工人,还有24个曾在1848—1849年表示同情“工人兄弟会”的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其中有1848年普鲁士国民议会前民主派議員尤利烏斯·伯連茲<sup>②</sup>。1851年6月24日开始了对“工人兄弟会”和24个被控支持和鼓励工人联合会的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审判<sup>③</sup>。瓦伦哈根·馮·恩色在1851年6月25日的日記中用以下的話記述这次审判的意义:“对工人联合会的审判查明了政府原来确实一无所知的联系,但是同时也查明了必然使政府心惊胆战而只能使人民党欢欣鼓舞的事实;人們看到,新的精神在人民中是如何根深蒂固,新的精神得到如何广泛的传播。审判案摧毁不了工人兄弟会,只能引起它的警惕,把自己隐蔽得更好,行动更加小心。我本人原不相信他們的組織那么强大,走得那么远。”<sup>④</sup>

16个被告,包括伯連茲,被判处十个塔勒的罚金,联合会被禁止了<sup>⑤</sup>。然而柏林工人运动并没有因而停止。1851年10月4日瓦伦哈根·馮·恩色在他的日記中記述:“昨晚警察

① 參閱布達登堡地方总档案館,波茨坦,1851年11月12日报告,載:第30目,第94項,A字,第100号,关于1850年工人联合会的文件。

② 參閱瓦伦哈根·馮·恩色:“日記”,第8卷,第186頁和189頁。

③ 參閱同上日記,第226頁。

④ 同上日記,第227頁。

⑤ 參閱同上日記,第230頁。

在此地三十多处进行搜查……许多帮工被捕了。不用说，今后还会变本加厉……”<sup>①</sup>。

1851年5月5日，辛凯尔迪得到一个暗探的报告：“在伦敦工业展览会期间，在政治方面最重大的事是：对协会事业贡献最大的俾斯基，将要到伦敦来担任大德意志‘工人兄弟会’的主席。”担任伦敦“工人兄弟会”主席的俾斯基同马克思在一起，这对普鲁士当局说来不仅是“在政治方面最重大的事”，而同时是惊人的消息。辛凯尔迪马上把这个消息转给内政大臣，并附告消息“来源可靠”。内政大臣再转告首相兼外交大臣冯·曼托伊费尔男爵，促使他在“工人兄弟会”举行会议的地方，汉堡和不来梅，也采取相应的对策<sup>②</sup>。工人的一切联合，尽管只是为了互助的目的，当局也认为是对现存的“制度”的一种威胁。

工人联合会越是信赖马克思及其学说科学社会主义，则对统治阶级的危险性越大。

### 3. 职工会

有许多职工会也加入了“工人兄弟会”，其中有德意志雪茄烟工人协会。

警察当局于1851年春天在科伦逮捕雪茄烟工人、同盟领导人勒泽尔之后，对德意志雪茄烟工人协会联合会特别注意。勒泽尔同时是德意志雪茄烟工人协会的副主席，警察当局认为这就是一切雪茄烟工人同共产主义者同盟有密切联系的证

<sup>①</sup> 瓦伦哈根·冯·恩色：“日记”，第8卷，第359页。

<sup>②</sup> 参阅德国中央档案馆第二馆，麦塞堡，第77目，第509项，第1号附件，第1卷。



据。雪茄烟工人同盟杂志“康科迪亚”（Konkordia）的編輯工作自1850年起也由一个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員負責，即由細木工斯特山<sup>①</sup>負責。斯特山于1851年9月在汉諾威被捕。但他越獄逃走了。1851年底，他来到伦敦。雪茄烟工人当时无疑是属于工人阶级的最活跃的代表之列的。不来梅在1851—1852年成为雪茄烟工人的中心。他们的政治和组织活动是由不来梅领导的；担任“工人兄弟会”的新中央委员会委員的雪茄烟工人科尔維就駐在那里，1851—1852年“工人兄弟会”也主要由那里领导。每一个帮工，尤其是每一个在不来梅的雪茄烟工人都被怀疑为共产主义者。1852年4月6日警察厅长馮·法尔德伦自杜塞尔多夫向柏林报告：“根据經驗得知，雪茄烟工人特地蜂拥往不来梅去——现在德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宣传的主要根据地，雪茄烟工人几乎全部早已受恶名昭彰的联合会的政治影响。”两天后，在1852年4月8日，普魯士首相曼托伊費尔通令普魯士各地警察总监采取措施，監視来自不来梅自由市的帮工。原籍普魯士的帮工要受訊問，特别是受監視，“外国帮工”，即黑森、維尔騰堡、巴登等地的帮工不許繼續流入普魯士。1852年7月26日，曼托伊費尔再一次使人注意严格执行1852年4月8日这个通令<sup>②</sup>。

警察当局尽最大的努力去解散所有的雪茄烟工人联合会。雪茄烟工人予以强有力的反抗。例如杜伊斯堡警察当局

① 瓦尔特·弗里施：“德国烟草工业工人的組織活动”，载“政治社会科学研究”，第24卷，第3期（总第113期），莱比錫1905年，第25頁。

② 德国中央档案馆第二館，表塞堡，第77日，第500項，第10号，第6卷，1851—1856年。

于1851年11月禁止了雪茄烟工人联合会。工人们上诉于军事法庭，军事法庭随即宣告禁令无效。可是直到哈姆上诉法院确认禁令合法，当局才罢休<sup>①</sup>。1852年4月15日柏林警察总局周报报导了慕尼黑雪茄烟工人联合会解散的消息，同时还列举了据警察当局确定还有雪茄烟工人联合会的18个城市，同样要尽可能把它们解散<sup>②</sup>。

1852年5月初，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爆发了雪茄烟工人的罢工。有25个雪茄烟工人被迫离开这个城市。他们的通行证上载明：“因集体停工和参加雪茄烟工人的革命联合会而被驱逐出境。”<sup>③</sup>

镇压和迫害德国工人阶级的运动也扩展到其他职工会来了。

普鲁士警察截获了奥古斯特·维利希1852年2月27日关于“德国共产党的状况”的报告，1852年4月18日柏林警察总局周报转载了其中一部分。摘录如下：

“在萨克森特别是对矿山可以寄以希望，纺织工人和花边工人全是革命者，那里是绝好的宣传场所，现已被利用。阿纳贝克、施内贝克一带在第一次警钟声中兴起来了，整个伏格特兰德的情况也可以说是如此……普鲁士省呈现同样有利的前景，其次是西里西亚。”此外，报告还提到，在柏林主要是消防工人可以寄以希望。还有“波恩钢铁厂和褐煤矿井的工人

① 参阅瓦伦哈根·冯·恩色：“日记”，第8卷，第443页。

② 参阅布兰登堡地方总档案馆，波茨坦，第30目，第94项，W字，第225号。

③ 布兰登堡地方总档案馆，波茨坦，第30目，第94项，W字，第225号，1852年5月19日柏林警察总局周报。

完全組織起來了。在德國北部，例如在漢堡和不來梅，已存在一個強有力的黨。”<sup>①</sup>

即使維利希據他自己的想法對當時德國工人階級的革命情緒作了過高的估計，德國工人階級發生騷動却是符合實際情況的。拉薩爾於1852年6月24日給馬克思的信談到了工人的階級覺悟有了更大的提高，他自然是用形而上學的說法寫出來的：“工人階級顯然在很大程度上和在廣大範圍內正準備利用政治上風平浪靜的機會，深入地體會自己的內在的東西，使自己的內在觀念變成意識，從而使自己堅強起來。目下的政治情況使資產階級遠比工人階級更為惱火和沮喪，更受壓抑，因為工人階級本來就知道他們對現狀不能有什麼要求，另一方面，他們本能地感覺到，專制制度的壽命的延長也就是資產階級直接統治時期相應的縮短。——所以他們利用這個過渡時期盡量活躍地給自己灌輸階級觀念，儘可能從各方面把階級觀念弄清楚，從理論上闡明其結論。

我用不着對您說，這個運動多末令人喜歡。它將產生這樣的結果：下次革命的時候，工人階級將擁有比1848年工人黨不得不臨時湊集的散漫分子團結得多、自覺得多的成份。如果我的估計不錯，真正的德國工人黨正在這個表面上死氣沉沉的時候產生。”<sup>②</sup>

1852年5月5日柏林警察總局週報列舉了德國59個地方，據警察探知，這些地方有“屬於‘工人兄弟會’的和提供

① 布蘭登堡總檔案館，波茨坦，第30目，第94項，W字，第225號。

② “斐迪南·拉薩爾遺信和遺著”，古斯塔夫·馬耶編，第3卷，斯圖加特—柏林1922年版，第52頁。

旅行補助費的”联合会，即职工会。这个报告最后說：“这件事是重要的，責成各地对显然已經复活的‘工人兄弟会’进行必要的調查或采取有力的对策，并要求把所获得的结果报告此間。”<sup>①</sup> 据1852年5月26日周报說，在卡尔斯魯厄有17个帮工“因参加工人兄弟会”（古滕貝克同盟、工人教育协会）而被驅逐出境<sup>②</sup>。1852年10月1日“柏林国外周报”要求各警察局比以前更严密地注意职工会工人的联合或“兄弟会”。周报在这里說：“近来再三出現了这种情况：雪茄烟工人、印刷工人、瓷器工人等得以参加仍然存在的兄弟会。在罢工期間竟为罢工工人募捐補助金。因此特請告知其他地方在这方面取得了什么經驗。”<sup>③</sup>

从这些事例中只能隱約地知道迫害工人运动的規模。瓦伦哈根·馮·恩色在1851年間在他的日記中曾多次談到了这些迫害情况，他在1851年11月13日写道：“我的日記本变成了上面天天干的可恥的勾当和愚蠢的事情的記錄；真够受，我記別的多好呀！但最糟糕的是我所写的还不到每天所发生的事件的百分之一。未来的历史学家可要下苦功去掌握全部材料。”<sup>④</sup>

① 布兰登堡地方总档案馆，波茨坦，第30目，第94項，W字，第225号。

② 同上。

③ 同上第188号，第3卷。

④ 瓦伦哈根·馮·恩色：“日記”，第8卷，第421頁。

## 六 当局对馬克思学說 广泛传播的恐惧

警察当局最担忧的是馬克思对德国工人运动的影响越来越大。在警察总监辛凱尔迪看来,所有其他工人領袖和馬克思比起来都是微不足道的。辛凱尔迪晓得,迫害工人运动的战果如何,取决于能否消除馬克思和共产主义者同盟对工人运动的影响。1852年4月6日“柏林国内周报”几乎以全部篇幅談論馬克思和它所謂的“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主义者联合会”或“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辛凱尔迪在周报中从来没有这样詳細地談論过运动。这期周报的目的是使当局了解:共产主义者同盟对現存的社会制度是何等的危險。这期周报首先指出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維利希-沙佩尔集团和“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之間的原則区别:“沙佩尔和維利希用种种办法为他們的集团收罗信徒,……不过沙佩尔-維利希这个集团的团结一致从来不是特別好的,在他們的會議上常常发生激烈的冲突;他們互相怀疑,这个集团的主要成員的狂妄的行动、他們的計劃和活动的过火已使他們自己在共产主义信徒中逐漸失去威信,所以近来在同盟中追随共产主义者同盟从前的領袖馬克思和恩格斯的人又开始多起来了,馬克思和恩格斯奠定了同盟原来的基础,他們是有学問的人,……直到現在他們的活動主要不是通过宣言和声明表現出来,而是通过他們确实較大地把智慧集中表現出来,或許在

短期內表現得更要突出。衡量一个政治党派的力量尺度是看它拥有多少坚定的，即坚持这个党的方向的人；因为在談不到彻底理解革命运动的地方，鼓动的力量由于它的顛倒是非即使不完全破产，那么至少几乎等于零，这是显而易見的。現在已有理由可以这样說馬克思-恩格斯的党，它比一切流亡者、鼓动家和中央委员会<sup>①</sup>高明得多，因为它无可辯駁地掌握了較大的知識和精神力量。馬克思本人是著名的人物，大家知道，他脚趾尖里的精神财富比其余整个社团其余的人脑袋里的精神财富还要多。”辛凯尔迪接着提到了馬克思在国外发表的著作，特別引証了他在其中諷刺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玩弄革命的言論。警察周报以这样大的篇幅刊载馬克思和共产主义者同盟的言論当然不是为了奉承馬克思和同盟盟員，而是为了証明同盟的宣传“也許是最大的、最穩当的；因为值得深思的是，尽管受到部分破坏，它把德国各地，首先是萊茵普魯士的优秀力量爭取到自己这一边来；它現在又不懈地致力于扩大宣传，它将表明它很会这一套。”柏林警察总监的周报結束語說：“馬克思的党由于它的危險性，大陆上应予以极大的注意，并且必須进行不断的严密的監視，正因为如此，此間对它已予以更大的注意。”<sup>②</sup>

因此，辛凯尔迪认为有必要在伦敦安置警官和警探，检查伦敦和德国之間的旅客往来。1851年伦敦工业展覽会提供了一个求之不得的借口，在伦敦設立警察机关，并在德国边境

① 指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中央委员会。

② 布兰登堡地方总档案馆，波茨坦，第30目，第94項，W字，第222号，柏林警察总局文件，1851—1852年柏林国内周报，第1卷。

加强检查。在这个借口之下争得德意志其他各邦共同采取这些措施。伦敦工业展览会在1851年10月闭幕了。辛凯尔迪早在1851年7月14日就已经写信给普鲁士内政大臣说：“伦敦有政治嫌疑的危险人物路经汉堡和不来梅前往大陆不仅仅限于工业展览会期间，所以即使展览会结束后，尤其是1852年，最好是对这个旅途予以更严密的注意。”<sup>①</sup>1851年7月21日内政大臣请首相冯·曼托伊费尔发出相应的指示。

1851年8月18日，普鲁士政府于是命令行政专员和警察总监对从伦敦回国的德国工人予以特别检查。1851年9月20日，普鲁士内政大臣在给各行政专员和警察总监的通报中提出这个问题：“1848年6月30日工商部和内政部通令撤销的禁止普鲁士的流动帮工前往瑞士的禁令，是否要恢复，是否也要酌情扩大到英国去。”接着说明理由：“共产主义运动首先在这两个国家培植起来，然后通过特使向外扩展。现在的季节，资金较少的手工业者本来已不宜于参观伦敦工业展览会，因此再也不能以这个作为去伦敦旅行的目的。”内政大臣在1851年10月17日通令中通知各行政专员，“伦敦工业展览会于本月11日结束后”，4月18日布置的关于旅客往伦敦参观展览会的周报可以不再作了。但是大臣同时强调：“然而我希望各警察局继续严密注意前往伦敦以及来自伦敦的旅客，注意那里的政治流亡者及其阴谋活动，在这方面一发现有可疑的情况就马上报告我。”<sup>②</sup>

① 德国中央档案馆第二馆，麦塞堡，第77号，第509项，第1号附件，第1卷。

② 同上，第2卷。

辛凱尔迪于1852年11月21日写信給普魯士內政大臣，企图再促使內政部以法律禁止工人去伦敦旅行：“因为伦敦，如科伦共产党人案件已确凿无疑地表明的，要看作是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所以有新的理由发布下官提出的禁令。”<sup>①</sup>

当局从来没有像1851—1852年那样害怕流动帮工。每一个工人、每一个帮工都被怀疑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特使。因此警察当局认为1851—1852年間流动帮工的增加是极不安定的迹象。民主和革命宣传的加强、民主运动的更加活跃也同样认为是极不安定的迹象，每一个帮工、每一个工人都被視為这个运动的流动宣传員。政府和资产阶级自1848年以来对工人阶级，“欧洲历次起义的真正的战斗部队”<sup>②</sup>，极为害怕。1852年2月22日柏林警察总局周报說：“据我国的十分注意检查的敏頓站报告，上月即一月份，过往的帮工多得惊人，他們成群結队地打公路經過。1851年1月，只办了267张旅行护照的簽證，而在1852年1月却办了570张簽證，不用办簽證的还不計算在內。特别是在乡村和小城市似乎特別需要加强对这些流动工的注意。”<sup>③</sup>一个星期之后，1852年2月28日柏林周报談到了同样的問題：“特別是一月份，涌到柏林来的过路帮工之多是往年在夏季所少有的。每天至少有80个左右；有时甚至超过100个，而前几年在一月份每天打这里

① 德国中央档案馆第二館，麦塞堡，第77目，第500項，第10号，第6卷。

②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論德国史”，第2卷，第460頁。

③ 布兰登堡地方总档案馆，波茨坦，第30目，第94項，W字，第225号，第1卷。



路过的帮工人数在 20 至 40 之间……特别是我国各邦现在从外国还乡的手工业者多得惊人。”<sup>①</sup>

1852年3月31日或4月初警察总监向普鲁士内政部的季度报告主要叙述流动帮工激增的情况。警察厅长兼县长馮·格尔哈特自馬格德堡的报告提供了统计材料：在位于德国中心的重要通道馬格德堡，从来没有给流动帮工办过像1852年1月、2月和3月份那末多的签证。在1848年第一季度，有2,989个帮工在馬格德堡办了签证手续，而1849年只有2,283个，1850年又达到2,998个，1851年增到3,013个，1852年达4,034个（均为第一季度）。据1852年4月4日报告，奥得河畔法兰克福1850年第一季度有1,860个流动帮工，1851年同期就有2,010个，1852年竟达2,560个。然而莱茵省的报告被认为是特别重要的，因为共产主义者同盟活动中心是在莱茵省，由莱茵省同侨居瑞士、法国、比利时和英国的侨民保持良好的联系。警察厅长兼县长容克于1852年3月31日自科布伦次报告，1851至1852年来往的手工业者简直是飞跃的增加。1851年第一季度，给1,649张手工业者的通行证加了签证，1852年第一季度增加到两倍多，即3,650张<sup>②</sup>。帮工在国内流动已引起警察当局的怀疑，怀疑他们在促进民主思想的秘密的不可阻遏的传播，所以游历过瑞士、比利时、法国或英国的帮工，在回国时简直是被当作罪犯看待，被逮捕、被彻底搜查、被讯问，有时被拘留一个较长的时期。在阿琛，有一队警察是专门负责监视由比利时

① 布兰登堡地方总档案馆，波茨坦，第30目，第94项，W字，第226号，第1卷。

② 德国中央档案馆第二部·麦塞堡，第77目，第500项，第10号，关于流动帮工革命联合会，第6卷，1851—1856年。

来的旅客的。列车有警官眼随着。关于此事，1851年12月31日柏林警察总局周报断言：“没有一个特使能通过阿琛站而不被发现。”1852年1月5日周报附件指使有关当局把对帮工和客商的搜查扩大到“来自民主党似乎仍然十分活跃和可以说占优势的不来梅、奥尔登堡或布劳恩施魏克”的人。公然以下述的理由为这个措施辩护：帮工“大部分信奉共产主义，并参加乱党”，“对流动帮工的行李及别的东西进行突然的检查”就会有許多违禁的宣传品落到警察手中<sup>①</sup>。除亚琛外，普鲁士警察当局还在哈姆、敏顿和帕德博恩设立检查站，以便监视所有从港埠来的帮工。辛凯尔迪于1852年2月草拟了一个进一步加强检查的计划，办法是在厄麦里希以及沿莱茵线直至美因兹设置岗哨。1852年2月28日周报这样说：“从美因兹起直到瑞士边境，依照这里的建议要请高地各邦采取同样的安全措施。为了保证更北的地区到这里的安全，维滕贝格和瓦尔诺火车站已由我方派遣警官把守，从现在起也要请汉诺威王国政府在认为适宜的地点采取同样的方法保证汉堡—哈尔堡—汉诺威—线安全，最后，还是为了防御南方，建议王国内阁以特派员把守爱尔福特和哈雷火车站。这样，普鲁士防止外来的危险分子或嫌疑分子的潜入才有相当保证。”<sup>②</sup>辛凯尔迪在1852年2月22日周报提醒人们注意：帮工们互相告诫，不带行李通过检查站。这一事实使得这个警察总监发出了如下通知：“因此，在这班帮工找到了长期工

① 布兰登堡地方总档案馆，波茨坦，第30目，第94项，W字，第225号，第1卷。

② 同上。

作和随后把行李运去的地方，对他们的行李进行检查，这种做法应认为是适当的。”<sup>①</sup>

1851—1852年当局对付帮工的行动引起了普遍的强烈的反应。关于此事，瓦伦哈根·馮·恩色于1851年7月31日在他的日記上写道：“官厅对待下层人民是最残暴无道的；工人、帮工、僕役毫无权利、毫无保障；人們把他呼来喚去，对他大发雷霆，譏諷辱罵，投入監獄，完全随心所欲，如果他不够慫恹，說話偶一不慎，就挨揍，被当作犯上者来处罚等等。拿走的文件、书籍不再还給他，手表、戒指和其他小东西——被捕者必須交出一切东西——也常常不翼而飞，穷人但願获释，不敢訴苦。”<sup>②</sup>

---

① 德国中央档案馆第二馆，麦塞堡，第77目，第500项，第10号，第6卷。

② 瓦伦哈根·馮·恩色：“日記”，第8卷，第278頁。

## 七 普魯士警察当局对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审讯方法”

然而当局对工人运动的迫害没有获得值得称道的效果。警察虽然经过加倍的努力，可是没有达到摧毁工人运动的核心即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目的。1851年5月间的逮捕未能使当局前进一步。搜查也好，检查流动帮工的行李也好，都没有查出可以加罪的材料。被捕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因阴谋推翻邦政府”，于1851年5月19日由国家检察机关开始审讯。预审推事审讯在科伦被捕的人时提不出可以作为“阴谋”证据的东西。1851年6月21日科伦检察长泽肯多尔夫不得不报告普鲁士司法大臣：有一些情况“恐怕要对审讯的进程和结果发生不良的影响”。他列为第一种情况的是审讯的分散性：毕尔格尔斯和诺特容在德勒斯登审讯、被捕的店员豪普特在汉堡审讯、雅科比博士在柏林审讯。泽肯多尔夫说：“审讯的分散性是从一开始就自然而然地形成的，尽可能置于统一领导之下，我认为这是有关政府和司法机关的首要任务之一。”这个检察长还强调：警察当局干预审讯对司法机关的工作是不利的，他“必须提出，今后警察当局不事先通知本地法院审讯机关而广泛参加审讯，特别是搜查，最好是限于一迟延就有危险或发现有现行活动的时候。”<sup>①</sup>司法部依警察总监辛凯尔迪的提議

<sup>①</sup> 德国中央档案馆第二馆，第77目，第505项，第16号，第1卷。

決定允許警察當局進行干預。司法部不僅同意警察當局干預市訊的進程，而且授予辛凱爾迪、施梯伯、舒爾茨和維爾穆特特殊權力，因為一開始就很清楚，只有通過他們的活動才能發現或虛構這種“陰謀”。法院審訊機關變成了警察、辛凱爾迪、施梯伯等人以及司法部的附庸。馬克思說：“除了平常的起訴人以外，政府還得挑選一個不平常的起訴人；除了檢察機關以外，還得叫警察出面；除了澤特和澤肯多爾夫以外，還得派出施梯伯和他的維爾穆特、他的烏兒格萊夫以及他的小玩藝兒戈德海姆。為了用特效的警察手段不斷向法律上的原告方面提供該方面所白費力氣、捕風捉影地尋找的種種事實，第三種國家力量對法庭的干涉就成為不可避免的。”國家檢察機關也終於看到這點了。關於這事，馬克思繼續說：“法庭很了解這種情況，所以庭長、法官和檢察官一個個都畢恭畢敬地把自己所扮演的角色讓給警務顧問兼証人施梯伯，並經常躲在他的背後。”“警察啟示”要提供“檢察院無法找到的”“客觀的犯罪構成”<sup>①</sup>。

所有的官廳、柏林警察總監、內政部和外交部都首先力求薩克森當局引渡畢爾格爾斯和諾特容。警察廳長舒爾茨到德勒斯登跑了几趟，強調引渡對揭露“陰謀”具有最大的意義。普魯士警官終於在1851年8月初，得以把畢爾格爾斯和諾特容自德勒斯登帶走<sup>②</sup>。

柏林警察總監在1851年8月8日給內政大臣的信中，對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462—464頁。

② 參閱德國中央檔案館第二館，麥塞堡，第77目，第505項，第16號，第1卷。

被授予特殊权力的警察厅长舒尔茨审讯在德国的被告所获得的进展表示满意。他特别满意的是达到了使萨克森当局引渡被告毕尔格尔斯和诺特容的目的。但是他同时责难驻伦敦的警官提供材料的工作没有获得进展，因此不能构成所企求的“阴谋”：“但是审讯在两方面还缺乏正当的根据，这是指同伦敦工人联合会的联系，同北德新成立的‘工人兄弟会’以及同中德、南德的工人联盟和阴谋活动的联系。而这两种联系十分值得注意，需要进行最严密的侦查。因为只有把它们秘密揭开，使当局对它们有正确的了解和足够的认识，原有的审讯任务才能解决。警察总局已收集了许多材料，关于同伦敦方面的联系，已给那里的普鲁士警官详尽的指示，指示原稿附在信内谨呈閣下审阅。但为了了解同北德、中德和南德的工人联盟的联系，警察厅长舒尔茨将于下星期到那些地区去视察。”<sup>①</sup>辛凯尔迪就这样供认：一切取决于证实同伦敦以及同其他工人联合会的联系，即发现“阴谋”。值得注意的是，辛凯尔迪给他在伦敦的官员的指示的副本没有同信件一起装订在卷宗里，而在其他场合下，连最细微的批示都保存着，因此，可以认为指示的内容是不想让非直接有关的人知道的。上面说的“许多材料”只能是施梯伯据说在1851年8月5日从伦敦获得的材料。马克思报导，这些材料是施梯伯通过一个“普鲁士警探”从维利希-沙佩尔集团的秘书迪茨那里偷来的<sup>②</sup>。辛凯尔迪给他的在伦敦的官员的指示大概是要他们用类似的方法提供更多的材料。过了十天，在1851年8月19日，辛凯

① 德国中央档案馆第二馆，麦塞堡，第77目，第505项，第16号，第1卷。

② 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469—470页。

尔迪认为向内政大臣预示“巨大的”收获是适时的，就是说“报告派遣警务顾问施梯伯前往伦敦的情况，由于这次派遣的结果，现已进行十分重要的侦查，结果如何目下还不清楚，因为警察厅长舒尔茨和警务顾问施梯伯还在忙于进行侦查。”<sup>①</sup>这次“侦查”的意义从辛凯尔迪1851年10月30日给普鲁士内政大臣的信可以看出来。辛凯尔迪及其帮兇施梯伯、舒尔茨等由于缺乏可以加罪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材料，采取了这个手段：使用不难从維利希-沙佩尔集团那里得到的材料控告同盟的被告。辛凯尔迪于1851年10月30日答复大臣的质问时供认：关于同盟的情况还侦查不出什么来，他继续写道：“去年9月同盟发生分裂后仍留在伦敦的以沙佩尔、奥斯涅德·迪茨、維利希为首的集团的情况则与此不同，他们比科伦人更讲实际，与其说他们坚持共产主义理论，不如说他们坚持尽快爆发全面的政治和社会革命……正是伦敦集团的阴谋由在伦敦和巴黎截获的文件暴露无遗，从这些文件，特别是最近截获的文件无疑可以看到伦敦共产主义者同盟<sup>②</sup>散布到全德国。”因此，辛凯尔迪知道科伦被告同維利希-沙佩尔集团没有关系。但是他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从維利希-沙佩尔集团那里获得的材料上面，宣称“一俟时机成熟……就把最新的材料拿出来”，并向大臣保证，继续“努力”进行“此事”<sup>③</sup>。警探如不盗窃或伪造文件，警察当局就不能提供控告被告的必要材料。密

① 德国中央档案馆第二馆，麦塞堡，第77目，第509项，第43号，关于在英国的政治流亡者的革命阴谋活动以及在伦敦成立的散播共产主义-革命倾向的德国社团，第1卷，1837年9月24日至1851年12月27日。

② 指維利希-沙佩尔集团。

③ 德国中央档案馆第二馆，麦塞堡，第77目，第505项，第16号，第1卷。

探和特务把他們所能获得的材料一概收下了。馬克思就此事写道：“普魯士的整个国家机构曾进行了极其紧张的多方面的活动”①。

这个“极其紧张的多方面的活动”首先在于伪造材料，收集密探报告，找原告方面的証人或叛徒。因为警察当局在工人联合会工人和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員那里找不到关于共产主义者的大阴谋的材料，只有伪造一法。无论付出什么代价都要“发现”“共产主义者的阴谋”。警察当局吹嘘他們捏造的“发现”十分重要。1851年8月21日，瓦伦哈根·馮·恩色在他的日記上記述了普魯士警察当局的这个“活动”：“我听說，警察当局热中于制造新的大阴谋，它不仅想拯救普魯士国家，而且想拯救一般国家，甚至共和制的法国，它还喜欢这个国家，是因为它有可耻的一面——路易·波拿巴总统。有无数的偵探在活动，揮金如土，普魯士的金錢大把大把地撒在伦敦和巴黎。我們会看到产品的！”②

馬克思在他的1860年出版的“伏格特先生”一书的一篇附录中专门論述了1851—1852年普魯士警察在伦敦的偵探活动，他在其中談到了1853年公布的密探威廉·希尔施的“辯护书”，由这份“辯护书”可看到，在伦敦的全部偵探活动是由上面已提到的普魯士大使館官員领导的。此外，負責“发现共产主义者的阴谋”的警务顧問施梯伯自己暫留伦敦。馬克思摘引希尔施的“辯护书”：“德意志联合会（在工业展覽会期間）受到警察三雄，即普魯士的警务顧問施梯伯、奧地利的庫伯施先生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461頁。

② 瓦伦哈根·馮·恩色：“日記”，第8卷，第307頁。



和不来梅警察厅长洪特尔的共同监视。”<sup>①</sup>这个“警察三雄”在世界展览会之后也作了巨大的努力，去监视在伦敦的马克思和拥护马克思的人。

普鲁士驻伦敦大使千方百计地竭力支持普鲁士警官在伦敦的特务偵探活动。他甚至以不能更多的献身于偵探活动为憾事。1851年11月1日他向柏林报告：“同时，我觉得十分惋惜的是：我身边没有像格莱夫警尉那样能干可靠的警探。一个驻英大使馆根本不能通过自己的官员观察这个国际城市中的政治阴谋活动，甚至要预防有失这样一个官员的体面的可能性，例如被人认出来，挨一顿揍，是他很可能遇到的事。然而大使大可以支持警官，特别是通过像办事员阿尔伯茨这样能干的人物。”<sup>②</sup>而大使的要“身边有能干可靠的警探”这个愿望很快就得到了满足。格莱夫接受了这个任务。如马克思所写的，这个人是“科伦的特别信使、伦敦的普鲁士警探头子、演出神秘剧的官方指挥者、被派到普鲁士大使馆里去当随员的警监。”<sup>③</sup>

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普鲁士警察当局……在普鲁士驻伦敦的大使馆里设立了一个真正的秘密警察分署。一个叫做格莱夫的警探以大使馆随员的头衔为掩护进行他的卑鄙活动——老实说，这种作法足以把普鲁士的所有大使馆都置于国际法之外，甚至连奥地利人也还不敢这样做。”<sup>④</sup>

普鲁士警察使密探混入伦敦工人联合会的第一次企图被

① 马克思：“伏格特先生”，柏林迪茨出版社1953年版，第333页；“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柏林迪茨出版社1952年版，第108页。

② 德国中央档案馆第二馆，麦塞堡，第77目，第599项，第43号，第1卷。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516页。

④ 同上书，第452页。

魏德迈耶粉碎了。1850年7月3日他曾經写信請馬克思注意：“我們得到柏林方面的报告，据說臭名远揚的許特将被派往伦敦当普魯士密探。”<sup>①</sup>

1851年底，警务顧問施梯伯确已物色到了汉堡的威廉·希尔施这个驯服的工具。关于希尔施，馬克思在他的“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中这样說：“1851年12月初，希尔施以共产主义流亡者的身分参加了‘馬克思的协会’。但是就在这个时候，汉堡方面的来信揭发他是一个密探。可是当时决定允許他在协会里留一个时期，以便对他进行考察，获得他究竟有罪还是无罪的証据。在1852年1月15日的集会上，曾宣讀了一封科伦来信，在这封信中，馬克思的一位朋友告訴他說，审判照例延期，并說甚至亲人也很难同被捕者見面。同时信中还提到了丹尼尔斯博士夫人。”<sup>②</sup>紧接着根据希尔施的报告在科伦丹尼尔斯夫人家里进行了搜查。希尔施被揭穿了。1852年3月3日馬克思写信給恩格斯說：“汉堡的‘希尔施’是密探，我們已于两星期前将他逐出同盟。他是在德国加入的，我从来没有完全相信他，在他的面前也从来没有发表絲毫可供指摘的議論。”<sup>③</sup>

希尔施躲到伦敦的一个郊区，奉普魯士警察当局之命写关于伦敦同盟會議的报告，并撰写小册子，作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宣传品寄給辛凱尔迪。警察当局想根据这样的伪造，給馬克思和同盟加上使用个人恐怖手段的罪名，从而在刑法上获得控告同盟的把柄。辛凱尔迪的1852年4月6日周报于是

① “沒有发表过的书信”，莫斯科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

②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495頁。

③ “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第1卷，參閱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374頁。

刊登了一份伪造的通告，这份通告据说是在1852年2月14日马克思自伦敦发出的。通告的标题为“球散你们的队伍！”，其中载有使密探和叛徒不能为害的要求。密探希尔施奉命精心制作这样的通告和传单，只是不能言过其“实”<sup>①</sup>。

尽管希尔施尽一切努力制造“符合实际的”内容，他自然找不到说理的教育的语言，这种语言是马克思领导的共产主义者同盟所惯用的。口气显然是陌生的带威胁性的命令口气。根本不能有别的，因为问题本在于欲加以有意煽动的罪名；因为对普鲁士警察当局说来要紧的不是说理，而是抓被控告的盟员的把柄。1852年3月20日“柏林国外周报”也刊登了一份传单，据说这份传单是“在伦敦新成立的马克思的共产主义者联合会……向世界发出的”，它的标题为“致平原、乡村和田野的人们”，而且包含同样的煽动性的命令口气。例如临末命令：“注意！请准备随时执行我们给你们指示：——行动的时刻已指日可待！现在我们发出通知：不久我们将带来刀剑作补充！”<sup>②</sup>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和这种强加在同盟身上的煽动性的言论之间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1860年，马克思在“伏格特先生”一书附录中指出，希尔施已供认奉警察当局之命制造“致农村无产阶级”的传单<sup>③</sup>。

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指出的，希尔施除此以外“每周都要

① 参阅马克思：“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柏林迪茨出版社1952年版，第112页。

② 布兰登堡地方总档案馆，波茨坦，第30目，第94项，W字，第188号，第2卷。

③ 参阅马克思：“伏格特先生”，第337页；“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柏林迪茨出版社1952年版，第113页。

編造一些关于普魯士警察当局根本无法破获的那个陰謀家組織的虛构中央委員會的虛构會議的虛构报告。这些报告的内容是最荒唐不过的。没有一个名字是确实的，没有一个姓是真有的，强加在这个或那個人身上的話，沒有一句是多少有点像这个人可能說出的話。”<sup>①</sup> 希尔施同另一个警探結果把“他們所捏造的全部报告改編成秘密的最高委員會（普魯士警察当局硬說有这么一个委員會）會議的‘原本記錄’”<sup>②</sup>。伦敦普魯士警察工厂把真是大量生产的偽造品提交审判。

警察当局只能获得极少的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发展情况的正确的情报。馬克思說：“实际上，被查获的只不过是一些无关紧要的信件。”<sup>③</sup> 偷拆信件是普魯士警察爱用的手段之一。馬克思和恩格斯在“1850年6月中央委員會告同盟书”中指出，由于“害怕信件被人偷拆，曾經一度无法通信”<sup>④</sup>。尽管要审慎，伦敦和在德国的朋友之間通过暗中約定的中立人士的地址进行通訊，自然不能全免。警察已注意到这些信件。他們力图查明这些信件在德国的收信人和发信人。辛凯尔迪在1852年4月15日“国内周报”中报导了青年盟員約翰尼斯·米刻尔于1852年2月26日寄往伦敦的給馬克思的一位亲密的同事皮佩尔的一封信；同时談到了馬克思在1852年3月4日写的信，信內有关于同盟在德国发展情况的較詳細的材料。

約翰尼斯·米刻尔的官运亨通（銀行家、国家自由党的国会議員、德国殖民联合会創始人之一，最后任普魯士財政大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453頁。

② 同上。

③ 同上书，第461頁。

④ 同上书，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59頁。

臣)更使人怀疑他在1851年秋或1852年春就变成了警察的中间人,他同马克思保持关系是为了给警察提供材料。警察厅长舒尔茨早在1851年6月就已经促使他在汉诺威的同事维尔穆特博上注意“法学硕士”米刻尔。雅科比博士到柏林旅行时在米刻尔家里住了三天,他当时就被捕了,而米刻尔却安然无事<sup>①</sup>。1852年2月17日“国外周报”再促使汉诺威当局注意米刻尔。“据伦敦方面报告,有个叫米刻尔的,哥丁根人,在汉诺威落户,是斯特山办的‘工人之声’<sup>②</sup>报的十分热心的撰稿人,继续同党保持联系。难道这不是1851年6月此间请汉诺威注意的本菲律师的助手、哥丁根的法学硕士米刻尔吗?”<sup>③</sup>最后一句含有一个暗示,即要当局同法学硕士米刻尔打交道。约翰尼斯·米刻尔1828年生于本特海姆附近的诺伊豪斯,曾在哥丁根和海得尔堡攻法学。法兰茨·梅林在他于1914年写的“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的导言中说,米刻尔,一个较年轻的盟员,“只是日渐远离同盟的目的”<sup>④</sup>。他后来发展成为国家自由党人和普鲁士财政大臣,这证明他没有站稳马克思主义立场。上面提到的1852年4月15日周报首先转载了他在1852年4月26日自汉诺威写给伦敦威廉·皮佩尔的信。米刻尔在这封信中对伦敦新成立的一个工人联合会表示“满意”。向警察当局报告米刻尔寄往伦敦的这封信的人不在伦敦,而是

① 参阅1851年6月12日报告,德国中央档案馆第二馆,麦塞堡,第77目,第505项,第16号,第1卷。

② 1848年革命报刊。

③ 布兰登堡地方档案馆,波茨坦,第30目,第94项,W字,第188号,第2卷。

④ 马克思:“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柏林延茨出版社1952年版,第166页。

在德国；因为柏林警察总监在周报中明确要求当局“十分谨慎，以免伦敦人获悉：人们对他们以及对他们的活动的消息如此灵通，此间的情报来源并不闭塞”<sup>①</sup>。因此米刻尔本人很可能就是警察当局的“情报来源”，他在1852年充当汉诺威的司法委员和警察的侦探，于是开始了终于爬上普鲁士财政大臣的职位的前程<sup>②</sup>。

① 布兰登堡地方档案馆，波茨坦，第30目，第94项，W字，第225号。

② 如威廉·蒙森在他写的米刻尔传（蒙森：“约翰尼斯·米刻尔”，柏林—莱比锡1928年版，第1卷，1826—1866年）中说的，米刻尔“背离”马克思是在1857年。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通信中可看出，米刻尔在1851年和1852年间常常往伦敦写信，有时通过同事皮佩尔。1851年7月13日马克思写信告诉恩格斯：“米刻尔自哥丁根来信。他的家中搜查过多次。没有发现什么。没有被拘留。哥丁根有五个新密使——绅士——去柏林等处。”（“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第1卷，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247页。）米刻尔，一反往常的惯例，在家中被搜查后仍安然无事，甚至自由自在地结束学业，接着进司法界，这不能不令人惊异。蒙森认为，米刻尔“逃脱了追捕，是因为他十分小心”。但他又指出：“米刻尔对共产主义组织的一切消息都非常灵通”。蒙森还承认米刻尔在马克思面前时常为小资产阶级辩护，他本来就站“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敌人维利希-沙佩尔集团的立场上”。米刻尔“尽管如此”仍留“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那边”，蒙森把这看作“他当时观点模糊”的“特殊”证据。（同上传记，第48—49页。）而事实上这不能说明米刻尔的“模糊”，倒是说明了他的卑鄙的企图。米刻尔在1854—1857年还继续同马克思通信。1854年5月，米刻尔在汉诺威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第二次法学考试之后，到巴黎旅行，还表示打算到伦敦拜访马克思。蒙森谈到了米刻尔此行的学习目的，但是他在脚注里不得不承认：“据米刻尔的一位朋友在1898年2月19日的‘汉堡消息’上报导，听说他是奉汉诺威司法部之命作这次旅行的”，这从家庭纪事中也看得出来。（同上传记，第61页。）米刻尔于1865年1月12日当选奥斯纳勃吕克市长时，政府为办批准手续要求警察当局给他作鉴定。哥丁根警察厅1865年1月19日的报告复述了一位警务顾问对米刻尔1848、1849及以后几年的行为的意见：“人们不认为米刻尔……是在政治信仰上绝对忠诚的人，人们责难他有虚荣心，认为他的行动的主要动力就在这

据1852年4月15日周报說，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德国发展的材料是取自1852年3月4日馬克思的一个报导。周报說：“馬克思于1852年3月4日告訴他的同盟，謝天謝地，由于克尔納博士逃出卡塞尔，沒有一个盟員被牽連，这是双重的喜事；同盟在德国的現况如下：在卡塞尔，同盟現有五十个盟員，不仅在卡塞尔，而且在哈瑙，支部的改組进行得很順利，那儿已成立由大約36个盟員組成的三个支部，这些支部吸收盟員的工作显得特別順利；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开始建立新的支部；达尔姆施塔特有15个盟員，他們在短期內将会合一起；美因茲是个糟糕的地方，因为維利希集团在那里占优势；科伦这个中心一向在他們手中，但是那儿的委员会委員全部被捕了，因此那儿尚存的五个支部必須十分小心地活动；在杜塞尔多夫有两个支部；在克雷費尔特有一个支部；在爱北斐特有三个支部；在布勒斯劳有两个支部；在克滕正打算恢复支部。总的說来，同盟在最后一个季度有了显著的进展，这是自那时以来采取的策略正确的最好証明，这个策略就是：采取守势，养精蓄銳，对局势始終采取批判的态度。”<sup>③</sup>

里。”接着引述一个未指名的人的意見：“要是您給米刻尔弄到一个投其所好、适合他的虛榮心的职位，他就会拋弃他的民主的旨趣”；还說，他在几次同米刻尔发生冲突的活动中发现了米刻尔确实 在很大程度上为虛榮心所支配。（同上传記，第385頁。）1852年他当司法工作人员的时候，就考虑他的前程，这种追求名位之心很可能使他适当地利用他同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关系。1884年5月5日米刻尔写信給国家自由党众議員馬卡德森說：“……我这里，我可以說，已作了明智的安排。1848年的这个幼芽并非长生不老。我很快就掌握了馬克思的邏輯。”（“新时代”，第32年度[1913—1914年]，第2卷，第189頁）

③ 布兰登堡地方总档案馆，波茨坦，第30目，第94項，W字，第225号，第1卷。

拿这个材料同“1850年6月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中的关于同盟发展的材料加以比较，同1851年5月逮捕后关于同盟发展的其他报导加以比较，使人有理由认为这个报告是符合事实的。柏林警察总监在周报中最后认为必须作关于同盟发展情况的切实的具体的报导，供官厅内部使用，这可以作为进一步了解详情、采取措施、迫害有关的人的线索。所以这份内部周报也常常坦白地供认：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水平比一切其他团体都高得多。例如，1852年4月28日周报有一篇关于同盟在汉堡的发展情况的报导（“1850年6月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把汉堡列为同盟主要中心所在的城市之一），报导中有如下的话：“最近汉堡方面向伦敦马克思的共产主义者联合会报告，汉堡又建立了五个支部。共产主义的毒草又继续蔓延，看来比社会民主党的以金克尔借款<sup>①</sup>占首要地位的可笑的鼓动更危险。因此对来自汉堡的工人必须予以最大的注意。”<sup>②</sup>

如希尔施事件所表明的，警察当局似乎有密探在汉堡。警察当局还物色到了1851年5月被捕的汉堡盟员豪普特这个叛徒。豪普特要在审判科伦中央委员会委员时充当主要证人。由于他的亲戚宁愿逃避这种耻辱，便把他送到里约热内卢去了，他在那里后来成为德国总领事<sup>③</sup>。

① 指金克尔和他的朋友在国外进行的关于所谓革命借款的宣传。

② 布兰登堡地方总档案馆，波茨坦，第30目，第94项，W字，第225号，第1卷。

③ 参阅“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52页。



警察当局特别注意同盟在科伦继续活动，因为中央委员会会址最后设在这里。1852年5月26日柏林警察总局周报刊登了一封信，这封信是警察当局不知道的写信人寄到伦敦去的。在这种情况下可以估计到这封信是警察当局违反通信秘密才获悉的。这张“周报”摘录了科伦的这封信：“我们这里的人仍像早先一样深切地关怀你们，正是马克思本人我们念念不忘。你们在真正的工人那里赢得了你们在1849年因一个派系背叛以及同资产阶级决裂而失去的东西。弗(弗莱里格拉特?)两星期以前曾有信给我们，他的信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唯妙唯肖地描写了你们可怜的对手(沙佩尔、维利希、迪茨等人)在那边的行动，我们本来不会同这些人往来。至少他们没有给我们来过信；维(维利希)将军曾两次往杜塞尔多夫寄信；我相信人们不会给他答复。我们同克雷费尔特、波恩、亚琛、爱北斐特保持经常的联系，听说它们很有干劲。这里的R君(不详)曾去克雷费尔特三次，我们最好是亲自进行联系，因为我们用邮寄的方法实在太冒险。我们早先通过伯书(伯特歇尔书店)转寄杜(杜塞尔多夫)，这条路现在已经行不通了。在埃姆登，你们一定已由约·莫(莫尔)处得到了由那里的贝君(贝德布厄，制造芥酱的)转交的地址，贝君也许知道得更多些，除此以外，我们不能给你们别的地址。”<sup>①</sup>

接着给各官厅的指示是以所转载的信为根据的。在科伦，要努力(可能通过伯特歇尔书店)查明写信人的和信中提

<sup>①</sup> 布兰登堡地方总档案馆，波茨坦，第30目，第94项，W字，第225号，第1卷。引文中的括号内的注释出自普鲁士警察之手；以他们的调查和推断为据。

到曾去过克雷費尔特三次的R君的名字，“一經查明，就到处进行搜查。但在上述的其他城市要特別注意工人联合会，因为只有在工人联合会才能找到共产主义者”<sup>①</sup>。

馬克思自1851年6月底以来，即自科伦中央委员会委員被捕以来經常收到他未見過面的候补公証人、盟員柏姆巴哈由科伦寄来的报告，柏姆巴哈不断地把审訊被告的情况告訴他。馬克思在他的“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一书中利用了这些报导。馬克思通过秘密約定的科伦通訊处同柏姆巴哈通信。1852年7月20日馬克思把柏姆巴哈的一封信的如下內容告訴恩格斯：

“昨天接到柏姆巴哈由科伦来信。信中主要之点如下：

‘近来各地方的各种人都想和您通訊，他們由那些人的介紹，要絕對钻入萊茵民主党的。您在科伦的朋友們終于提审于陪审法庭。所提出的公訴状是一种范围很广大的文件……’”<sup>②</sup>

柏姆巴哈还提請注意下面这点：“而且公訴状包含各种細目，从而可看出他們通过截获的信件和特务活动相当准确地查明了某些关系和人物。”<sup>③</sup>

但是馬克思同科伦的联系显然不限于柏姆巴哈。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通信中在同盟的事务方面常常談到同科伦的联系。1852年8月30日馬克思在給恩格斯的信中提到同盟的一

① 布兰登堡地方总档案馆，波茨坦，第30目，第94項，W字，第225号，第1卷。

② “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第1卷，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415—416頁。

③ 參閱同上书，第416頁。

件紧急的事件：“我立即向科伦方面作了报告。”<sup>①</sup>

在进行审判的那些日子里，由伦敦寄来的每一封信都被普鲁士政府偷拆了。马克思在“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中写道：“普鲁士政府经常把委托给它的邮局的信件拆开，而在科伦案件审理期间，它特别爱干这种勾当。亚琛和美因河畔法兰克福能提供许许多多有关这一方面的情况。哪一封信能从政府当局手里溜过去，哪一封信要落到政府当局手里，这全靠碰运气。”<sup>②</sup>

马克思托科伦商人科特斯转交柏姆巴哈的一封信被截获了。科特斯于1852年10月17日、柏姆巴哈于10月18日被捕了。科特斯恢复了自由，而柏姆巴哈则坐了五个星期的监牢。马克思写道：“通过对他的逮捕，宣布了一项同马克思通信的新罪行，并确定这种罪行应受到监禁的惩罚。这就必然要妨碍每个普鲁士公民交出自已的姓名地址来。”<sup>③</sup>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第1卷，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440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493页。

③ 同上书，第194页。

## 八 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的意义

经过一年半的预审后，科伦陪审法庭于1852年10月4日开始公开审判，到11月12日结束。警察带着伪造的证据开进法庭作“证人”。马克思写道：“在法庭辩论时，到场的有两个警察厅长——一个活的，一个死的<sup>①</sup>；一个警务顾问——而这就是施梯伯；两个警监，其中一个经常从伦敦跑科伦，另一个则经常从科伦跑伦敦；许许多多警探和下级警探，他们有时用真名，有时又匿名，有时用五花八门的名字，有时又用化名，带尾巴的和不带尾巴的；另外还有一个警局督察员。”<sup>②</sup>

起诉书只包含警察当局于一年半以前，即1851年5月逮捕被告时发现的资料，即所有的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1848年3月“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查获的信件证实了被公布的文件所说的被告的活动。这样就确定了被告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由告同盟书可看出同盟的原则。但是所谓起诉材料没有包含什么“阴谋”证据。这时施梯伯及其帮兇拿出他们的“材料”，这些“材料”是费了很大的功夫和花了一年半的时间制造出来的。“原本记录”被奉若至宝。马克思说“原本记录并不是一个孤立的情节；它是政府

<sup>①</sup> 舒尔茨于1852年夏天死了。

<sup>②</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519页。

活动的种种线索，即来自大使馆和警察当局、内阁和各地方当局、检察机关和邮政局、伦敦、柏林和科伦等等方面的种种线索的集结点。原本记录对案件具有如此重大的意义，以致把它发明出来，完全是为了制造案件。派信使、发快信、扣留信件、逮捕、违背誓言，无非都是为了使原本记录保持有效，falsa〔伪造〕，无非是为了制造原本记录；企图收买，无非是为了证明原本记录是真的。”①

马克思经过不懈的努力，几天之内就揭露了警察当局的伪造。警察当局用尽一切办法企图阻止被告及其辩护人在法庭上把他们的伪造揭穿。然而马克思却设法通过曲折的途径把必要的证明材料送到辩护人的手里。对于他所作的巨大的努力，燕妮·马克思给移居美国的盟员克鲁斯的信已予以最好的说明，这封1852年10月28日的信说：“想您一直在注意‘科伦日报’上的共产党人的大案件。10月23日的开庭，使整个案件发生了重大的有趣的而且对被告有利的转折，因此我们大家都又有所觉察了。您可以想像得到，‘马克思党’是日夜地忙着，头脑和手脚都必须工作……警察所提出的一切都是谎言。他们偷窃、伪造、撬开写字台、发假誓、作伪证，还自命他们有这种特权，来对付站在 hors la société②的共产主义者！这种情况和警察当局以穷兇极恶的方式接管着司法部的种种职务的作风……，把无法证明的招贴、纯粹的謠言、情报、道听途说当作真正经过司法程序确定的事实，当作证据提出来，这一切真令人发指。揭露伪造的全部证据必须由这里提出，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532页。

② 社会之外。

为此我的丈夫不得不整天工作，直到深夜……还得把全部材料誊写六至八份，通过不同的途径經法兰克福、巴黎等地寄到科伦去，因为凡是寄給我丈夫的信件以及由这儿寄往科伦的一切信件都被偷拆和截取了。現在全部問題在于警察和我丈夫之間的斗争。一切事情，整个革命，甚至审判的进行都推在我丈夫的身上……

刚才收到維尔特和恩格斯寄来的一包包商人的地址和伪装的商业信件，用以轉寄文件和书信等……我們这里已經建立了一个完整的机构，两三个人写作，其他一些人跑腿，还有些人攢錢，使写作的人能够維持生活，提出关于旧官僚世界的贖古未聞的醜行的証据。”<sup>①</sup>

揭露警察的伪造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馬克思写道：“原本記錄的秘密被揭穿就等于巨大案件的秘密被揭穿。”<sup>②</sup>

对被告的判决发生了問題。不仅普魯士政府，就是資產階級也陷于尷尬的境地。被告和他們的朋友，首先是馬克思，不仅揭穿了伪造文件，而且揭露了旧社会用以反对工人階級的手法。由于缺乏阴谋的証据，政府和資產階級及其報紙就設法补救，辱罵被告的学說是有害的怪誕的。英国資產階級，它的警察曾支持普魯士警察在伦敦的特务活动和阴谋詭計，也认为这个案件是符合它的利益的、反对工人階級的行动。由于对案件的结局的疑惧被人知道了，英国資產階級的主要報紙，伦敦“泰晤士报”和“每日新聞”，就拚命誹謗被告和他們的伦敦朋友。馬克思、恩格斯、斐迪南·弗萊里格拉特和威廉·

<sup>①</sup> “馬克思恩格斯通信选集”，迪茨出版社1953年版，第88和89頁。

<sup>②</sup>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532頁。

沃尔弗于是在1852年10月28日寄給这两家报纸编辑部一份声明，这份声明获得了广泛的传播，并且有助于揭露普鲁士警察当局的手法。这份声明也在威廉·魏特林在纽约出版的“工人共和国”报上发表了。声明说：普鲁士“报纸最坏也不过是配合着国家起诉人的说法把科伦的被告和我们这些在伦敦的朋友描写成‘对近四年来欧洲的整个历史以及1848年和1849年所有革命震荡要负完全责任的危险的阴谋家’，而在伦敦却有两家公开的机关报‘泰晤士报’和‘每日新闻’，竟出言不逊地把科伦的被告和我们几个人描写成‘一帮游手好闲的无赖’、‘骗子手’等等。我们也向英国公众提出被告辩护人曾向德国公众所提出的同样请求——在案件审理完毕以前，不要忙于作出自己的判断。如果他们现在就作进一步的说明，就会使普鲁士政府有可能阻碍揭发警察局所干的违反誓约、伪造文件、篡改日期、窃盗等等一切骗人勾当，这些勾当甚至在普鲁士政治司法史册上都是没有先例的。当所有这一切在当前的审理过程中被揭露出来时，英国的社会舆论，对于扮演最下流最卑鄙的政府密探的辩护人和喉舌的‘泰晤士报’和‘每日新闻’的匿名作者，将作出公正的评价。”①

如果以被告参加共产主义者同盟、以同盟抱有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为理由来判罪，那末，揭露伪造在世界舆论界中所造成的影响可能因而遭到破坏。马克思说：“随着记录本的真相大白，案件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现在陪审员们已无法承认被告有罪还是无罪了；现在他们必须承认的是：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429—430页。

被告有罪，还是政府有罪。宣判被告无罪就等于判决政府有罪。”<sup>①</sup>

現在案件的問題已不是确定被告是否有罪，而是要給他們判罪，因為他們擁護獨立的工人黨。黨通過共產主義者同盟的工作獲得發展，一個這樣的黨的存在被認為是侵犯資產階級社會的罪行。因此判決書宣布了三至七年的徒刑，雪茄煙工人勒澤爾被判了七年，占第一位。

電訊傳來宣判的消息，柏林宮廷和資產階級皆大歡喜。然而政府和資產階級却不能無憂無慮地慶祝他們的“勝利”。儘管絞盡心血，案件絲毫沒有達到目的：消除工人階級給他們造成的危險。相反地，任何合法的或非非法的手段都不能阻止工人階級的發展，這點已變得很明顯了。同盟領導人約瑟夫·魏德邁耶在警察追捕之前就逃到美國去了，在那裡繼續積極從事工人運動，1853年1月15日他在紐約的德文“體育報”寫道：“我們不久以前看到的科倫陪審法庭審理的案件堪稱德國史上劃時代的事件。無產階級作為一個從一切其他社會階級分離出來的、另有明確表現出來的利益的、另有革命目的的政黨，第一次在這裡出現。革命工人的秘密組織在資產階級法庭上被揭露，他們的代表被判罪，並不是因為他們有什麼陰謀，而是因為那些合法的政黨不願意承認他們的政黨有存在的權利。資產階級社會除了指定工人充當沒有意志的生產工具之外，不能給他們別的地位，對獨立的最微小的要求就是造反，就是犯罪，這已由科倫資產階級陪審員的判決得到新

<sup>①</sup>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530頁。



的証明。”<sup>①</sup>

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的远远超出德国范围的意义在于：它公开地表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1875年1月8日馬克思在“真相”的跋語中指出：“科伦共产党人案件本身是国家当局在其反对社会发展的斗争中无能为力的标志。”<sup>②</sup>政府不敢公布第一次起訴书。1852年11月29日柏林警察总监馮·辛凱尔迪对内政大臣馮·威斯特伐里亚說，他“认为单单公布科伦共产党人案件起訴书……既无必要也不适宜”。可見，警察当局和内政部自己再也不相信利用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文件作为起訴材料能达到他們的目的；他們生怕公布起訴书会害他們自己。辛凱尔迪向内政大臣建議替代的办法：責成他的两个最可靠的警探施梯伯博士和維尔穆特博士“把迄今一切有关共产主义者活动的調查材料系統地整理成为一本书，专供当局使用”。关于案件本身，辛凱尔迪在“加强治安报告”中只公布了 1. 国家檢察官塞特的导言， 2. 警務顧問施梯伯博士的証詞以及 3. 警察厅长維尔穆特博士的供述”。内政大臣不仅同意刊行維尔穆特和施梯伯写的那本书，而且表示准备以 350 塔勒的价錢收买 350 本<sup>③</sup>。維尔穆特和施梯伯因而获得了为当局整理他們收集的伪造材料的机会，以便今后用来迫害工人阶级，进行反对馬克思和他的拥护者的宣传和攻訐。如恩格斯所說的，“本世紀两个最卑鄙警察恶

① “体育报”，紐約，第二年度，第19号，1853年1月15日，第147頁。

② 馬克思：“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柏林迪茨出版社1952年版，第123頁。

③ 參閱德国中央档案馆第二館，表塞堡，第77日，第505項，第16号，第2卷。

徒搞出的这个充滿故意伪造的騙人劣作”<sup>①</sup>的第一卷“十九世紀共产主义者的陰謀”于1853年4月初就已經出版了。

警察当局和內政部极其不安，因为馬克思和他的朋友們的活动一点也沒有受到妨碍。1852年11月18日，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结束后不久，馬克思、恩格斯、弗萊里格拉特、沃尔弗发表了一篇声明，在这篇声明中不受拘束地公开揭露了审理案件的手法：“所有的与其說是为了証明革命傾向不如說是为了提供陰謀的事实証据的文件，就这样被証明純粹是政府的伪造。政府十分害怕在公众面前被揭露，以致不仅普魯士邮局中途截取那些寄来供辯护用的文件，甚至施梯伯也設法吓唬辯护人，使寄給他們的証明文件得以扣压下来，他所用的手段是在出庭作辯护时以追究同下面署名人进行‘犯罪的通訊’来威胁他們。”<sup>②</sup>这个声明特地在外国的德文报刊上发表了。

原想使工人运动威信扫地的案件却使普魯士政府自己威信扫地。工人階級的独立运动不是什么陰謀活动，而是为了社会进步，这点已經变得很明显了。馬克思写道：“因此，‘共产主义者同盟’并不是一个陰謀家团体，而是一个秘密地进行組織无产阶级政党的团体，因为德国无产阶级被公开地剝夺了igni et aqua[必需的生活条件]，被剝夺了出版、言論和結社的自由。如果这样的团体也进行秘密活动，那末，这只有在蒸汽和电进行反对status quo<sup>③</sup>的秘密活动的意义上才会发

① “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35頁。

② “文学报和紐約刑事新聞”，第39号，1852年12月10日。这是在美国說德語的居民中銷路很广的一家周刊，(1852年底)每期印数一万份。

③ 現存秩序。——譯者

生。”<sup>①</sup>

案件已經表明：任何判決都不能消滅工人運動。已經表明：這個運動具有馬克思賦予的社會主義世界觀，從而獲得了一種警察採用各種辦法都無力抗拒的力量。因此，資產階級、警察當局和政府對科倫共產黨人案件之後比以前更加恐懼了。警察當局不能阻止社會上對被判決者表示巨大的同情。這從瓦倫哈根·馮·恩色在1852年11月13日所寫的日記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來：“令人沮喪的消息從科倫傳來！出乎大家意料之外，只有雅科比、丹尼爾斯、克萊因和厄爾哈特被宣告無罪，勒斯納被判處三年徒刑，賴夫、奧托和貝克爾被判處五年徒刑，勒澤爾、畢爾格爾斯和諾特容甚至被判處六年徒刑，並且被褫奪公權，以後還要受警察監視。這是一個可恥的完全不公正的判決！政府可惡地為此作了一切準備，用了一年半的時間，去指定陪審員，玩鬼把戲等。——一個像施梯伯這樣的人倒逍遙自在，可以自鳴得意，要求獎賞，而優秀的人物却在監獄中受盡折磨！讓干這樣壞事的首惡和一切幫兇以及附和者受一切咒罵吧！我希望：——這裡和萊茵河畔的整個法學界都深信，根據現行的法律，被告是不能被判罪的。可是現在的普魯士法官、普魯士陪審員是什麼東西呀！我覺得十分痛心！”<sup>②</sup>

馬克思和恩格斯曾在1852年11月號召開支援被判決者大會，警察當局也未能阻止這些大會的召開；警察當局唯有用陰謀詭計才得以阻難這個運動。警察廳長蓋格爾於1853年1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522頁。

② 瓦倫哈根·馮·恩色：“日記”，第9卷，第411頁。

月13日自科布伦次向行政专员馮·默勒报告：“被判决者的朋友和党徒之間确有联系……但主要是努力在这里那里募捐，为各个被判决者的家属筹措救济金，使被判决者本人获得补助金。例如，人們目前想給被判决者弄褥子。警察不能阻止个人这种捐錢要求。另一方面，当被判决者的朋友，以辯护人施奈德尔第二为首，想在一家酒店摆設一棵聖誕树——聖誕树自身本来是不带伤风败俗的东西的——，并抽签分派挂在上面的东西的时候，不用說，我已予以禁止，维护了禁令。”<sup>①</sup>

可以假定，科布伦次不是孤立的，工人們在別的地方也展开了同样的活动。警察的措施固然使参加工人运动的人数有所减少，可是这并没有使政府高枕无忧。政府看到經常的危险在于：工人和进步的公民的小小的核心仍然忠于这个事业，繼續秘密地活动。普魯士駐联邦議会代表馮·俾斯麦于1853年11月不得不提請联邦議会以及普魯士政府注意这个从有觉悟的民主主义者的小核心发出来的危险，他要求采取最可靠的措施：用暴力消灭这些人。这个“关于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及附近地区的民主党的状况和希望的备忘录”說：“民主党的秘密活动最值得注意的是：运动的真正的领导人彼此間繼續通訊，他們通过信件和个人旅行同国外的政治朋友繼續通訊，这是可以明确地断定的。但是这些人由于久經鍛炼，十分老练，使警察逮不住他們，甚至使刑事法庭无隙可乘……这些真正的阴谋家在警察的报告中通常称为‘泰斗’，人人知道他

<sup>①</sup> 德国中央档案馆第二館，麥塞堡，第77日，第505項，第16号，第2卷。

們是彻头彻尾的叛国者，但在法律上却是不可侵犯地在我們中間轉來轉去，唯有在軍事專政時期把他們抓起來，使之不能為害，除此沒有別的办法對付他們。”<sup>①</sup>科倫共產黨人案件既然沒有達到預期的結果，俾斯麥于是以聯邦議會代表身份建議謀殺工人運動的領袖。普魯士警察已經走上了所謂救國、救資產階級社會制度的罪惡的道路，如俾斯麥早在1853年要求的，這條路還要走下去，直至把一切工人領袖殘殺淨盡。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英國則繼續致力於進一步發展科學的社會主義，不斷地加強了他們對各國工人運動的影響。這是資產階級社會及其國家執行他們的罪惡計劃的重大障礙。不能把馬克思和恩格斯發表的著作看作流亡者文獻就完了；因為它們不是從任何幻想和想像出發，而是從科學的認識出發的。列寧用簡短的話說明了為什麼馬克思的著作具有巨大的影響：“馬克思的學說所以萬能，就是因為它正確。”<sup>②</sup>列寧說：“馬克思學說中的主要的一點，就是闡明了無產階級這個社會主義社會創造者的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作用。”<sup>③</sup>教育工人階級自我認識和自覺的馬克思主義科學，終於使工人階級獲得了粉碎統治階級的罪惡計劃的力量。

在科倫共產黨人案件之後，普魯士當局為了阻止傳播案件的真相，對馬克思進行了殘酷的鬥爭。然而普魯士當局却不能阻止當時的一家大報“紐約每日論壇報”在1852年12月22日發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篇關於科倫共產黨人案件

① “1851—1859年聯邦議會中的普魯士”，第1編。文件，第323—324頁。

② “列寧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頁。

③ 同上書，第13卷，第581頁。

的文章，这篇文章明确地指出：未来是属于工人阶级的。但是这时普鲁士警察和侦探机关却行动起来，企图把马克思在案件之后不久写的“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拿到手。普鲁士警察已经得悉，这篇文章要在巴塞尔付印。在案件审理期间，由于伪造被揭穿，“政治警察的存在”就已经受到了威胁。辛凯尔迪当时曾给伦敦普鲁士大使馆写信说：“整个政治警察的存在取决于这次案件的判决！”<sup>①</sup>现在“揭露”又使政治警察处于危险的境地。辛凯尔迪在1853年2月6日“柏林国外周报”中通报德意志联邦各个警察机关：“著名的共产主义者领袖马克思的一部新的革命著作正准备在巴塞尔刊印……王国内政部下令没收这部著作。”<sup>②</sup>

1853年3月7日马克思从巴塞尔来信得悉，巴登警察已查获“揭露”两千份<sup>③</sup>。巴塞尔出版商担心巴登警察会上诉瑞士联邦委员会，担心这事会引起轩然大波。1853年3月22日马克思写给恩格斯的信说：“普鲁士政府想把事件完全掩盖起来，甚至由外交大臣追查听说我在巴塞尔出版的一种‘共产主义理论’。因此，他们连书名也要对公众隐瞒。”<sup>④</sup>辛凯尔迪也使人追查马克思写的“共产主义理论”。但是这时经流亡到美国的同盟盟员魏德迈耶等人的周旋，“揭露”由波士顿“新英格兰报”重新刊印了。恩格斯在1853年5月18日可以告诉

① 转引自马克思：“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柏林迪茨出版社1952年版，第121页。

② 布兰登堡地方总档案馆，波茨坦，第30目，第94项，W字，第188号，第3卷。

③ 参阅“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第1卷，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517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第1卷，参阅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525页。

馬克思：“新英格蘭報今天通知我，有四百二十本‘揭露’要送到我的住所來，明天也許會收到……至遲一星期內也可以收到。”<sup>①</sup>

無法確定有多少本“揭露”寄到了德國，在那里秘密地流傳。由於條件非常困難，只能是一個很小的數目。然而這部著作完成了工人運動中的一個重大的任務；它澄清了這個問題：在工人運動中“玩弄陰謀、把革命當作兒戲對工人運動本身和對事業都是同樣有害的”。維利希和沙佩爾不了解，在1849年失敗後從事工人運動必須從新的前提出發。他們的沒頭沒腦的行動，他們的狂熱的革命鼓動使敵人的特務得以順利地進行工作。維利希-沙佩爾集團的這種行為使他們不由得變成了工人階級敵人的幫兇。1875年馬克思在“揭露”再版後記中說：“在危機的時刻輕舉妄動就是對黨犯了罪，要公開的贖罪。”<sup>②</sup>

因此，科倫陪審員想打擊的、資產階級和政府想消滅的科學社會主義，由於馬克思孜孜不倦的工作而豐富起來了，並獲得了進一步的發展。當德國警察窺伺工人、企圖阻止他們舉行集會、阻止他們出版刊物、判處更多的工人“叛國”罪的時候，馬克思正致力研究他的偉大的政治經濟學著作，如他在1859年2月1日寫給約瑟夫·魏德邁耶的信說的，“我們黨”即工人階級的被迫害的黨，“希望”以這部著作“取得一個科學上的勝利”<sup>③</sup>。任何法庭、任何政府都不能爭奪工人階級的這個

① “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第1卷，三聯書店1957年版，第535頁。

② 馬克思：“揭露科倫共產黨人案件”，柏林迪茨出版社1952年版，第121頁。

③ “新時代”，第25年度（1906—1907年），第2卷，第181頁。

胜利。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提綱“德国共产党三十五年”說：“历史教导我們，無論是攻訐和誣蔑，或者是迫害和血腥的恐怖都不能消灭工人阶级的政党。”<sup>①</sup>

如恩格斯指出的，从科伦共产党人案件时起就結束了“德国共产主义工人运动第一时期”。但是在以后的时期里“……馬克思还在1844年就已預見到的德国无产阶级赫然可畏的大力士形影在日益增长……”<sup>②</sup>1885年恩格斯这样強調：日益壮大的工人运动是1836至1852年“那时的德国工人运动的直接繼續”<sup>③</sup>。1851—1852年被迫害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說在一百年后改变了世界。

① “德国共产党三十五年”，參閱世界知識社1954年版，第3頁。

② “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53頁。

③ 同上书，第335頁。



## 参 考 书 目

### 1. 馬克思列宁主义經典著作

馬克思：“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柏林迪茨出版社 1952 年版。

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載“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61 年版，第 117—224 頁。

馬克思：“資本論”，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

馬克思：“1848 年至 1850 年的法兰西階級斗争”，載“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7 卷，人民出版社 1959 年版，第 9—125 頁。

馬克思：“政治經濟学批判一书序言”，載“馬克思恩格斯文选”，第 1 卷，第 339—343 頁。

馬克思：“僱佣劳动与資本”，載“馬克思恩格斯文选”，第 1 卷，第 47—83 頁。

馬克思：“在人民报創刊四周年紀念会上的演說”，載“馬克思恩格斯文选”，第 1 卷，第 336—338 頁。

馬克思和恩格斯：“1850 年 3 月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載“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7 卷，人民出版社 1959 年版，第 288—299 頁。

馬克思和恩格斯：“1850 年 6 月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載“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7 卷，人民出版社 1959 年版，第 359—366 頁。

“馬克思恩格斯通信选集”，柏林迪茨出版社 1953 年版。

“馬克思和恩格斯致倍倍尔、李卜克内西和考茨基等的信”，莫斯科—列宁格勒 1933 年版。

“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第 1 卷，三联书店 1957 年版。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載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論德国史”，第 2 卷，柏林迪茨出版社 1954 年版，第 351—468 頁。

恩格斯：“馬克思‘1848 年至 1850 年的法兰西階級斗争’的导言”，載

- “馬克思恩格斯文选”，第1卷，第95—115頁。
- 恩格斯：“社会主义由空想发展为科学”，載“馬克思恩格斯文选”，第2卷，第93—154頁。
- 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載“馬克思恩格斯文选”，第2卷，第335—354頁。
- 恩格斯：“建立新德意志帝国的暴力和經濟”，載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論德国史”，第2卷，第1054—1107頁。
- 恩格斯：“卡尔·馬克思”，載“馬克思恩格斯文选”，第2卷，第155—165頁。
- 恩格斯：“論馬克思著政治經濟学批判一书”，載“馬克思恩格斯文选”，第1卷，第344—353頁。
- 恩格斯：“馬克思著的資本論”，載“馬克思恩格斯文选”，第1卷，第441—448頁。
- 列宁：“卡尔·馬克思”，載“列宁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5—72頁。
- 列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載“列宁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12頁。
- 列宁：“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組成部分”，載“列宁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8頁。
- 列宁：“論临时革命政府”，載“列宁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430—449頁。
- 列宁：“馬克思学說的历史命运”，載“列宁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581—584頁。
- 列宁：“国家与革命”，載“列宁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71—478頁。
- 列宁：“怎么办？”，載“列宁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13—500頁。
- 斯大林：“略論党内意見分歧”，載“斯大林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79—117頁。
- “卡尔·馬克思，他的詳細年譜”，莫斯科1934年版。
- “回忆馬克思”，柏林迪茨出版社1953年版。

## 2. 档 案

### 德国中央档案馆第二馆, 麦塞堡

第77目, 第500项, 第10号,

关于流动帮工的革命联合会。

第5卷 1844—1850年

第6卷 1851—1856年

第77目, 第505项, 第16号,

关于1851年在科伦发现的共产主义和革命的阴谋活动。

第1卷 1851—1852年

第2卷 1853—1856年

第77目, 第509项, 第1号, 附件,

关于对付德国革命鼓动的指令和安全措施, 特别涉及 1851 年在伦敦举行的工业展览会。

第1卷 1851年3月28日至8月31日

第2卷 1851年9月2日起

第77目, 第509项, 第26号,

关于拿騷公国有政治嫌疑的活动和人民骚动, 1832—1853年。

第77目, 第509项, 第43号,

关于在英国的政治流亡者的革命阴谋活动以及在伦敦成立的散播共产主义-革命倾向的德国社团, 第1卷。

### 布兰登堡地方总档案馆, 波茨坦

第30目, 第94项, A字, 第100号,

关于工人联合会, 1850年。

第30目, 第94项, B字, 第321号,

关于“西德意志报”前出版者赫尔曼·亨利希·貝克尔博士先生, 1851年。

第30目, 第94项, R字, 第208号,

关于科伦雪茄烟工人勒泽尔, 1851—1857年。

第30目, 第94项, R字, 第208号b,

关于囚雪茄烟工人勒泽尔向政府供述而进行的揭发共产主义者团体的审讯。

第30目,第94項,W字,第188号,

关于柏林国外周报。

第1卷 1851年

第2卷 1852年

第3卷 1852—1853年

第30目,第94項,W字,第225号,

关于柏林国内周报。

第1卷 1851—1852年

莫斯科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

約瑟夫·魏德迈耶：“沒有发表过的书信”。

### 3. 报纸和杂志

“文学报和紐約刑事新聞”,1852年12月。

“社会”,柏林1930年。

“新莱茵报”,科伦1848年。

“新时代”,斯图加特,第25年度(1906—1907年),第2卷;第32年度(1913—1914年),第2卷。

“工人共和国”,工人兄弟会中央宣传机关报,紐約,威廉·魏特林主編,第3年度,1852年12月。

“体育报”,紐約,第2年度,1853年1月。

“在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第2年度,1928年3月。

“前进报”,慕尼黑1848年。

“西德意志报”,科伦1849年。

### 4. 其他文献

M. B.:“国际的历史”,莱比錫1872年版。

巴契晓夫:“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发展規律的科学”,“新世界”1950年第4期。

奥托·馮·俾斯麦侯爵:“回忆录”,斯图加特和柏林1921年版,第1卷。

弗里茨·布呂格尔:“科伦工人协会的历史”;“社会”杂志,柏林,第7年度,第1卷,1930年。

瓦尔特·弗里施:“德国烟草工业工人的組織活动”,“政治社会科学研究”,第24卷,第3期(总第113期),莱比錫1905年。

- “德国共产党三十五年”，世界知識社1954年版。
- “斐迪南·拉萨尔的遗信和遗著”，古斯塔夫·馬耶編，第2和第3卷，斯图加特-柏林1922—1923年。
- 弗里德里希·勒斯納：“社会民主运动六十年”，伦敦1907年。
- 奥托·馮·曼托伊費尔男爵：“回忆录”，第1卷，亨利希·馮·波辛格尔，柏林1901年。
- J. I. 馬耶：“对馬克思和恩格斯传记的新贡献”；“社会”杂志，柏林，第7年度，1930年7月第7号。
- 法兰茨·梅林：“对馬克思和恩格斯传的新贡献”，（約瑟夫·魏德迈耶的遗著）：“新时代”，斯图加特，第25年度（1906—1907年），第2卷。
- 法兰茨·梅林：“柏林1914年第4版导言”，载馬克思“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柏林施茨出版社1952年版，第145—170页。
- 威廉·豪森：“約翰尼斯·米克尔”，第1卷，1828—1866年，柏林-萊比錫1923年。
- 阿尔弗雷德·鄂皮茲：“关于1850—1852年德国工人运动发展的文件研究”；“中德意志档案研究”，內政部国家档案管理局出版，柏林1953年。
- “1851—1859年联邦議會中的普魯士”，普魯士王国駐联邦議會代表处文件集，馮·波辛格尔博士編，第一編，萊比錫，1882年。
- 拉都斯-森科維奇：“共产主义者同盟史”（1850年9月至1851年8月）；苏联“历史問題”，1948年第11期。
- 卡尔·吕定格尔：“1848—1850年巴伐利亚工人运动”，博士論文，慕尼黑1934年。
- 路德維希·薩洛蒙：“德国报业史”，奥尔登堡和萊比錫1900—1906年。
- F. A. 左尔格：“約瑟夫·魏德迈耶”；“先鋒”，插图人民年鑑，紐約1897年。
- 阿道夫·斯特勒克福斯：“柏林五百年史”，第2卷，第4版，柏林1886年。
- 怀特·法伦廷：“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和1848—1849年革命”，斯图加特1908年。
- 卡尔·奥古斯特·瓦伦哈根·馮·恩色：“日記”，第8、9卷，苏黎世1865年。
- 維尔穆特和施梯伯：“十九世紀共产主义者的陰謀”，第3卷，柏林1853年。

# 譯名对照表

## (一) 人名

**A**  
Alberts 阿尔伯茨

**B**  
Bauer, Heinrich 亨利希·施威尔  
Becker, Hermann 海尔曼·貝克尔  
Becker, Johann Philipp  
約翰·腓力普·貝克尔  
Bedbube 貝德布厄  
Benfey 本菲  
Berends, Julius  
尤利烏斯·伯連茲  
Bermhach 柏姆巴哈  
Bisky 俾斯基  
Bismarck, Otto von  
奧托·馮·俾斯麥  
Bismarck-Schenhausen  
俾斯麥·申豪森  
Bonapart, Louise 路易·波拿巴  
Böttcher 伯特歇尔  
Bürgers 毕尔格尔斯

**C**  
Cluss 克魯斯  
Colquhoun, James  
詹姆斯·科庫洪

Colway 科尔維

**D**  
Dalwigk 达尔維希克  
Daniels, Roland  
罗兰·丹尼尔斯  
Dietz, Oswald 奧斯渥德·迪茨  
Dungern 頓格伦

**E**  
Eberhardt 厄伯哈尔特  
Ehardt 厄尔哈特

**F**  
Faldern 法尔德伦  
Freiligrath 弗萊里格拉特  
Fries 弗里茲  
Frish, Walter 瓦尔特·弗里施

**G**  
Gangloff 甘格洛夫  
Gelger 盖格尔  
Gerhardt 格尔哈特  
Goldheim 哥尔德海姆  
Greif 格萊夫  
Gutenberg 古騰貝克

## H

Haschal 哈沙尔  
 Haupt 豪普特  
 Heyn 海因  
 Hinckeldey 辛凯尔迪  
 Hirsch, Wilhelm 威廉·希尔施  
 Homann 霍曼  
 Hunteln 洪特伦

## J

Jacobi 雅科比  
 Junker 容克

## K

Kamptz 卡姆普茨  
 Kallner 克尔纳  
 Kinkel, Gottfried  
     哥特弗里德·金克尔  
 Klein 克莱因  
 Kleist-Retzow 克莱斯特-勒塔夫  
 Kothes 科特斯  
 Kubesch 库伯施

## L

Lessalle, Ferdinand  
     斐迪南·拉萨尔  
 Leske 勒斯克  
 Leßner, Friedrich  
     弗里德里希·勒斯纳  
 Lüning 柳宁

## M

Manteuffel, Otto Theodor  
     奥托·泰奥多尔·曼托伊费尔

Marx, Jenny 燕妮·马克思  
 Mayer, Gustav 古斯塔夫·马耶  
 Mehring, Franz 法兰茨·梅林  
 Merck 麦克  
 Minutoli 米奴托利  
 Miquel, Johannes  
     约翰尼斯·米刻尔  
 Moeller 默勒  
 Mohr 摩尔  
 Moll, Josef 约瑟夫·莫尔  
 Mommsen, Wilhelm 威廉·蒙森

## N

Notjung 诺特容

## O

Opitz, Alfred 阿尔弗雷德·鄂皮兹  
 Otto 奥托

## P

Patzke 帕茨克  
 Pfeffer 普费费尔  
 Pfordten, von der  
     冯·德尔·普佛滕  
 Pieper 皮佩尔  
 Poschinger, Heinrich von  
     亨利希·冯·波辛格尔  
 Puttkamer 普特卡默

## R

Radus-Senkowitsch  
     拉都斯·森科维奇  
 Reiff 赖夫  
 Reis 莱斯  
 Rochow 罗霍夫

Rüser, Peter Gerhard

彼得·洛尔哈特·勒泽尔

Rüdinger, Karl 卡尔·吕定格尔

### S

Sädt 泽特

Salomon, Ludwig

路德维希·萨洛蒙

Schapper, Karl 卡尔·沙佩尔

Schirrbach 施尔巴哈

Schneider II 施奈德尔第二

Schulz (Schultz) 舒尔茨(舒尔兹)

Schurz 叔尔茨

Schütte 许特

Schweninger 施维宁格尔

Seckendorf 泽肯多尔夫

Simons 西蒙斯

Smidt 斯密特

Sorge 左尔格

Stechen 斯特山

Stieber 施梯伯

Strauch 斯特劳吓

Streckfuß, Adolf

阿道夫·斯特勒克福斯

### V

Valentin, Veit 怀特·法伦廷

Varnhagen von Ense

瓦伦哈根·冯·恩色

Vogt, Karl 卡尔·伏格特

### W

Weerth, Georg 格奥尔格·维尔特

Wermuth 维尔穆特

Westphalen 威斯特伐里亚

Weydemeyer, Josef

约瑟夫·魏德迈耶

Willich, August

奥古斯特·维利希

Witzleben 维茨勒本

Weitling, Wilhelm

威廉·魏特林

Wolff, Ferdinand

斐迪南·沃尔弗

Wolff, Wilhelm 威廉·沃尔弗

## (二) 地名

### A

Aachen 亚琛

Ansbach 阿纳贝克

Augsburg 奥格斯堡

### B

Baden 巴登

Bamberg 班堡

Basel 巴塞耳

Bayern 巴伐利亚

Bentheim 本特海姆

Bilk 毕尔克

Bockenheim 博肯海姆

Braubach 布劳巴哈

Braunschweig 布劳恩施魏克

Bremen 不来梅

Breslau 布勒斯劳

### D

Darmstadt 达尔姆斯塔特



Dietz 迪茨  
Dillenburg 狄伦堡  
Dresden 德勒斯登  
Duisburg 杜伊斯堡

### E

Elberfeld 爱北斐特  
Emden 埃姆登  
Emmerich 厄麦里希  
Erfurt 爱尔福特

### F

Frankfurt an der Oder  
    奥得河畔法兰克福  
Frankfurt an Main  
    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Freiberg 弗赖堡

### G

Göttingen 哥丁根  
Gießen 吉森

### H

Halle 哈雷  
Hamburg 汉堡  
Hamm 哈姆  
Harnau 哈瑙  
Hannover 汉诺威  
Harburg 哈尔堡

### K

Karlsruhe 卡尔斯鲁厄  
Kassel 卡塞尔  
Koblenz 科布伦茨  
Köln 科伦

Köthen 克滕  
Krefeld 克雷费尔特

### L

Launstein 兰施泰因  
Leipzig 莱比锡  
Limburg 里姆堡

### M

Magdeburg 马格德堡  
Main 美因  
Mainz 美因兹  
Marienberg 马连贝格  
Minden 敏顿  
München 慕尼黑  
Münster 明斯特

### N

Nassau 拿骚  
Neubaus 诺伊豪斯  
Nürnberg 纽伦堡

### O

Offenbach 奥芬巴赫  
Oldenburg 奥尔登堡  
Oranienstein 奥拉年斯泰因  
Osnabrück 奥斯纳勃吕克

### P

Paderborn 帕德博恩  
Potsdam 波茨坦

### R

Regensburg 雷根斯堡  
Rheinessen 莱茵黑森  
Rheinland 莱茵省

Rheinpreußen 萊茵普魯士  
Rodelheim 勒德爾海姆

S

Sachsen 薩克森  
Sachsenhausen 薩克森豪森  
Schaumburg-Lippe 紹姆堡-立貝  
Schlesien 西里西亞  
Schleswig-Holstein 什列斯維希-霍爾斯坦  
Schneeberg 施內貝克  
Schwerin 息韋林  
Stettin 斯塔丁  
St. Goarshausen 聖·哥阿爾斯豪森

Stuttgart 斯圖加特

V

Vogtland 伏格特蘭德

W

Worms 沃爾姆斯  
Warnow 瓦爾諾  
Wostaden 維斯巴登  
Westphalen 威斯特伐里亞  
Wittenberge 維滕貝格  
Württemberg 維爾滕堡  
Würzburg 維爾茨堡  
Wurzen 符爾岑

Z

Zürich 蘇黎世